

反濫用警權

人權公約在香港



警權膨脹

港府色厲內荏

評江澤民的建黨80週年講話

中國：西部大開發的意圖和難題

世界社會論壇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開

21世紀宣言 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的胡說

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為軍國主義鋪路

資本主義的瘋狂帶來瘋牛症

以巴衝突——阿拉伯人為自決權而戰鬥

人權公約在香港特區

振言

對香港情況的批評

儘管香港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及文化公約》和《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成為締約成員之一；但香港的人權實況有很多都未能符合那些人權的要求，甚至違反有關的規定，而港府卻明知故犯，經各方面批評指出後，仍遲遲不加以改進。

例如，經社文權利公約委員會在94年和96年兩次要求香港政府全面取締籠屋、設立最低工資和合理工時制，但港府至今沒有落實這些要求，以致殘酷剝削工人的情況繼續存在。例如，政府公廁工人多月前被揭發每小時工資只得7港元，每日工作長達14小時，等等。特區政府的政策特別偏重保護工商業有錢人的利益，導致貧富懸殊日益加劇。對於種族、年齡

和性別等歧視，仍在持續發生，港府仍沒有立法加以阻止，沒有提供法律援助服務。

今年4月下旬，上述委員會正式審議香港政府提交的人權報告時，委員批評港府一直未有為《經社文權利國際公約》作全面的本地立法、不設立人權委員會、不立法禁止種族歧視；委員們希望港府可運用龐大儲備，將香港由側重經濟發展的物質主義社會，轉化為重視社會公平公義的社會，消除貧窮和歧視。

在審議了港府提交的報告後，經社文委員會公佈了審議結果，在多個領域批評港府。它「嚴重關注」香港貧窮狀況普遍，情況「無法接受」，而大批老人則得不到社會服務。港府沒有全面及有效的消除貧窮的策略。因而強烈建議港府設立獨立的除貧委員會，制訂除貧策略。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28卷 第3期 (總第206期)

2001年9月15日出版

出版人：十月書屋

編輯：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督印人：陳昌

地址：九龍觀塘敬業街65號敬運工業大廈14樓N座

電話：9846 3428

傳真：2346 5268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號

電郵地址：or@earthling.net

Address：G.P.O.BOX 10144, HONG KONG

Tel.No.：(852) 9846 3428 Fax：(852)2346 5268

E-mail Address：or@earthling.net

承印：藍馬柯式印務有限公司

地址：鰂魚涌華蘭路十四號

益新工業大廈16字樓C座

電話：2563 1068

定閱：(本地) 每年港幣八十元

(外地) 平郵：每年US\$15

空郵：亞洲US\$18

其他US\$22

Subscription Rates:

Hong Kong:	HKD\$80 per year
Overseas Surface Mail:	US\$15 per year
Air Mail (Asia):	US\$18 per year
Air Mail (Others):	US\$22 per year

【十月評論內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該委員會又首次直指港府違反《國際人權公約》，未有在私人領域禁止種族歧視，罕有地勒令港府提早在2003年提交進度報告。

審議結論形容，居港權及家庭分離的問題會引致痛苦，港府應注意《國際人權公約》對他們的保障，並公開有關資料。

港府高層的回應

香港民政事務局局長林煥光在會議前夕在港報撰文，指聯合國「委員會不是法院，其建議在國際法中並沒有約束力」。這個意見在委員會審議港府提交的人權報告會上，遭到委員們的反擊，認為人權公約是在國際上有權威、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政府不可不予尊重。

林煥光在審議會上備受各方面批評的壓力下，被迫改變說法，承認委員對設立人權委員會的提法「很有說服力」，承諾港府將認真考慮成立人權委員會；同時表示：港府會再研究制訂《種族歧視條例》。針對人權委員質疑他為何撰文指該會建議沒有約束力，他在出席會議後表示，事件純屬文字上的誤會，文章只是解釋為何委員會的一些建議未能全面落實。（4月28日《東方日報》）

但同一的林煥光，後來在6月13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卻表示，香港的架構完備，已經有效地保障和改善人權，因此，無需另設機構（即指人權委員會）去監察人權。在司徒華、劉慧卿兩議員指出特區政府對經社文委員會的提議置若罔聞後，律政司司長梁愛詩回應說，經社文權利國際公約或任何其他聯合國人權公約均沒有規定締約國必須設立特定的人權機構；經社文委員會不是法庭或司法機構，所提出的建議沒有約束力。（6月14日《文匯報》）

林煥光的最新表態，重新改變了他不久前在經社文委員會審議會上的承諾，他所學的毋須設立的「理由」並不是新近才產生的，所謂「完備」的架構早已存在，這些架構並不同於人權委員會、具有同樣的特定功能。它們雖早已存在，事實證明並不能有效地保障和改善人權，才引起前述的許多批評。而且，何以他當時仍認為委員會設立它的提法「很有說服力」，承諾將加以「認真考慮」呢？

梁愛詩之堅決拒絕建議，與政府發言人的如下表

示也是相矛盾的：「香港特區政府會堅守承諾盡力採取措施，逐步使公約所承認的權利得到充分落實。」

（4月28日《文匯報》特寫）儘管這項表示更多的是一種官式外交詞令，不會「充分落實」的。

如果梁愛詩這些推搪藉口能夠成立，則特區政府便可以完全推卸掉香港作為聯合國人權公約締約成員所必須履行的義務和責任，（《公約》在《前文》中列明：本公約締約國「鑒於聯合國憲章之規定，各國負有義務，必須促進人權及自由之普遍尊重及遵守」。）而只享受其權利和得益。如果每個締約國都抱持梁愛詩這樣的態度，那麼，這些人權公約還有什麼締結的價值和必要？

由此再一次暴露特區政府高層的野蠻無理、拒絕接受合理的建議；同時也再一次表明，要真正改善香港的人權狀況、消除貧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等等，主要還是要靠港人自己的努力去爭取，聯合國人權公約和國際社會的壓力，最多只能起部份的促進的作用。

2001年8月6日



警權膨脹 港府色厲內荏 微波

數十個民間團體700多人在香港回歸4週年前舉行集會遊行，批評特區政府4年來施政失當，在人權、法治、自由及民主4方面都沒有改善，因而要求由一人一票普選下屆特首，讓港人真正當家作主。

可是，特區政府卻害怕任何政治上反對的民間言行，決意走向反民主人權、加強警力鎮壓的道路，警權膨脹，更甚於港英時代。這可從近年來兩次以高度武力鎮壓和平示威者得到清楚證明。

其一是在回歸3週年前夕，6月26日，約20名學聯成員和爭取居港權人士進行和平靜坐示威，遭到逾百名警員驅趕，在他們撤離時，警員仍追著他們當面近距離發射胡椒噴霧，使多人傷眼，健康長期受損，有的警員在背後拳打眼部受傷者後腦，有些警員合力把受傷者擲在地上，並踩上一腳。但這些被橫暴打傷的和平示威者，反而被警方拘捕，5位學聯成員更被控參與未經批准的集會，違反了臭名昭著的《公安條例》。警方在1年多之後，對這事件發表的調查報告，對當時警員向和平示威者所作的非常野蠻的暴力行動避開不談，拒不認錯，不但企圖卸責，而且反把受害人士任意抹黑，彷彿警方全對、和平示威者全錯、而當日全港記者和民間的攝錄報道都全是虛構也似的！

其二是《財富》雜誌於今年5月8日在港舉行全球論壇，警方出動3千名警員保安，用以對付幾百名的和平請願示威者，遠超出回歸時的2千警力，並把示威區規定在遠離論壇會場之外，使示威者的抗議訊息不能傳給出席論壇的政經首腦人士，而且限制每個團體的示威人數不超過20名，超過1百名法輪功學員則被拒入境。這樣剝奪人民示威自由的安排，再次顯出警權的任意膨大。

在示威當日，警方更使用極粗暴而絕不必要的武力，在遠離示威區500米處，截停支聯會的廣播車，警員衝前用手按著司機伍國雄的頸及鼻超過半分鐘，多名警員更把車上各人強行拖出，其中的梁俊威遭到警員毒打，又以武力搶走示威物品——棺材，加以沒收。事後警方反而以襲警及破壞公眾和平「理由」，拘控伍國雄等3人。

社會民主論壇7名成員，在全球論壇舉行前夕以「鐵鏈自鎖」示威，也被拘控以阻差辦公罪。

這些都是「惡人先告狀」、被告與原告位置顛倒

的典型事例！也是對江澤民當日在論壇上吹噓回歸後港人「獲得充分的自由和前所未有的民主權利」的極大諷刺！

但是，鎮壓力度越大，反抗聲音也越大！警方對和平示威者的肆意壓迫、挑釁，結果激起示威者的反抗，一度包圍警署要求釋放被捕示威者。

警方這樣的濫用武力和高度壓制手法，引起許多社會人士的非議，普遍批評港府過份緊張，令香港國際形象受損。

甚至連全球論壇的主辦機構財富集團傳訊副總裁麥泰萊也強調，該集團從無要求警方把示威區遠離會場；該集團作為一家傳媒機構，全面支持言論自由和表達意見自由，對於政府的禁制深切關注和感到失望。（5月10日《星島日報》等港報報道）

此外，對於綠色和平兩位成員為抗議雀巢公司用基因改造產品損害市民健康，自鎖於該公司門外，也被當局拘捕，且由法庭控以阻塞交通等「罪」，重判各罰款900元並留案底。這是警方會同法庭為保護資產者利益而任意迫害市民的又一新例證！

另一方面，香港記者協會則發表2001年言論自由年報，指出香港言論自由正逐漸被收窄。

在特區政府這許多的倒行逆施之下，港人對政府和特首的不滿也在增加。民政事務局7月9日至13日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有51%被訪者對政府的表現不滿，比5月份增加7個百分點；有54%被訪者表示不滿意香港目前的情況，只有13%對明年感到樂觀。（8月2日《蘋果日報》）

此外，職工盟在6月底7月初以傳真方式向各政府部門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公務員隊伍對董建華為首的領導班子有信心的不足1成，信心不足和沒有信心的被訪公務員竟高達74%，普選特首和立法會的，均有超過8成被訪者表贊同，只有15%反對。（7月9日《蘋果日報》）

以上的調查結果例子足以反映出廣大市民對特區政府及其首腦不滿、失望的普遍而嚴重。也正因為如此，當局便企圖以警力高壓來鎮懾人民的反對（即使是和平地進行的）。這也反映出港府的色厲內荏；人民和港府的反應是互為因果、互相影響的。

2001年8月20日

評江澤民的建黨80週年講話

張開

江澤民在慶祝中共建立80週年大會上，發表了長篇講話。這篇講話總結過去的「偉大」業績，闡釋了「三個代表」的理論，提出了讓資本家及其他社會階層份子入黨的主張。中央黨校副校長李君如誇讚這個講話「標誌著共產黨形成了新世紀黨的建設的戰略性偉大綱領」；官方的宣傳主調更高歌江講話所提出的「三個代表」要求是中共的「立黨之本、執政之基、力量之源」，彷彿在他這次提出之前，中共就沒有這三種要素也似的！人們意圖以這些構成江澤民學說，以便與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平列齊觀，作為培植對江澤民個人崇拜的資本。

以下，且讓我們來檢視、評論這個「綱領」是如何「偉大」吧！

對過去的總結評價

講話首先盛讚中共在80年間的奮鬥業績和經驗。應當肯定，中共利用蔣介石國民黨當時的腐敗無能和人民對它的極度不滿，領導農民武裝推翻國民黨反動政權，建立了新中國，是一個非常重大的革命成就。但他說：我們「全面確立了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使佔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東方大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這卻是對馬克思、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學說的極大歪曲。按照馬克思、恩格斯的主張，社會主義社會是人人都能夠「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中更加以詳細闡釋，指出人民（除剝削者以外）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所享受到的民主自由，是比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多出無數倍的。可是，50多年來，在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民能夠「各盡所能，各取所值」，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嗎？在民主自由方面，人民不但連資產階級性的民主自由都享受不到，而且還生活在毫無民主自由的極權統治之下。這種現實，是國內外人民都可認識到，不容中共領導人自吹自擂的。

中共在成為唯一的執政黨後，完全師承前蘇聯斯大林的獨裁手法，對人民實行官僚統治，各級幹部則享有無限的政治上經濟上特權，與工農及城鄉民眾處於對立地位，構成官僚統治者與被統治的人民之間的主要社會矛盾。幹部的政經特權，必然產生貪污腐化，這種貪污瀆職、腐敗無能侵蝕著社會肌體。儘管中共從1953年起提出過許多次的反貪污腐化鬥爭，但長期的事實證明，黨政幹部的貪污腐化卻越來越普遍而嚴重。其根本原因

就在於官僚特權制度是它們產生的根源和背後靠山。

更由於政治特權及官僚集中制機制，幹部橫行無忌，絕不受人民監督約束，加劇了個人獨斷獨行，決策、施政不斷犯錯，產生一連串的路線政策錯誤。其最顯著的有：

一、在1956、57年，毛澤東領導中共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等「陽謀」來「引蛇出洞」，等到許多知識份子「暢所欲言」地起來響應之後，他就轉變之為「反右派鬥爭」，把響應者打成右派，長期受盡政治上迫害。胡耀邦後來指出，多年來受迫害者連同其家屬有一億人之多。

二、1958至60年，毛澤東領導全黨驅使全國人民高舉「三面紅旗」（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線），用「全民大煉鋼」、「衛星田上天」來企圖加速使中國「超英趕美」；用「多快好省」的「總路線」來驅迫人民「戰天鬥地」地苦幹。而人民公社的強迫推行，完全違反了農民意願和利益，重犯了30年代斯大林強迫農民一律參加集體農場的嚴重錯誤；結果農民以消極怠耕來抗拒，並立即引起糧食減產，連續三年大飢荒，大量人民被餓死。雖然劉少奇們後來在政策上作出讓步，但直至1978年鄧小平取消人民公社以前，20年間，中國的農產品產量始終增加很少，主因就是受人民公社政策之害。

三、1966年5月，毛澤東領導其嫡系「四人幫」，為了從劉少奇等人手中重奪黨政大權，竟用「文化大革命」為幌子，進行「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整肅一切的或可能的異己，釀成全國的「十年浩劫」（中共後來對「文革」的評語），數百萬人被批鬥至家破人亡，更使國家經濟瀕於崩潰邊緣。

可是，像上述那樣長期為禍全國的非常嚴重錯誤，在江澤民今天以最高領袖身份總結過去的經驗教訓時，竟然只是輕描淡寫、空洞含糊地一筆帶過：「我們黨在歷史上的一些時期曾經犯過錯誤，甚至遇到嚴重挫折」。而更可笑的，他依然在重彈那銷聲多時的舊調：「事實充分證明，中國共產黨不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三個代表」的發明

江澤民繼近年來提出要幹部「三講」（講學習、講

政治、講正義)以此來「修正錯誤」後，在這次講話中又著重闡釋「三個代表」的新發明。

他所說的「代表」之一是：「我們黨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要求」。但實際上，中共從黨內到國家機構所實行的官僚體制，恰恰是中國生產力的桎梏（具體表現是它過去的官僚「計劃經濟」模式和強迫命令主義），障礙著生產力應有的迅速、健康發展；改革開放政策雖逐漸擺脫了過去的官僚模式，卻又推使中國朝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全面發展，以致經濟雖有可觀的增長率，卻是越來越遠離社會主義的目標的。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見解，能夠發展到最先進的生產力的，是真正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而不是資本主義。

「代表」之二是：「要始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即，「必須努力體現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的要求，促進全民族思想道德素質和科學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發展先進文化，就是發展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文化，就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可是，中共現時的路線方針政策既然是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而更加背離社會主義這個目標的，又怎能是在發展社會主義的文化？如果一定要認為會有社會主義文化而先界定其內容或特點，那麼，概括說來，它就應該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優點的。但中國一直以來的實際情況和發展趨向，都是沒有、反而遠離這些優點的。

「代表」之三是：「要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使人民群眾不斷獲得切實的經濟、政治、文化利益。」但實際上，這點同上述兩個「代表」一樣，都是假大空話。以最廣大的8億農民來說，中共在走上全國政權以前，曾經得到農村人民的重大幫助，它也曾經承諾過要替農民及其他人民爭取利益，為他們服務；可是，在掌權之後，這些承諾都被它背棄了。尤其是農民，長期間不但生活沒有顯著改善，反而肩負著日益沉重的捐稅攤派重擔。其間雖經中共中央幾次提出要加以減輕，但「始終」無法根本做到。這是最顯著的事例，說明中共的好聽說話「始終」是美麗的謊言。

主張資本家等入黨

江澤民今天提出「三個代表」的主張，實際意義就是要為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製造理論前提，為大力發展這種經濟、贊揚其代表人物作辯護。他跟著說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階層構成發生了新的變化，出現了民營（即私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於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

層。」

江澤民於是主張：「也應該把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份子吸收到黨內來」。他所指的「社會其他方面的優秀份子」，就是包括前面所列出的新變化出現了的各個社會階層，尤使人注目的是民營企業的創業人員、私營企業主等。

據《明報》記者得自「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共組織部門正在制訂具體措施，物色私營企業主加入中共。消息人士說，中共計劃從現在至明年秋天十六大召開前的一年時間裡，在全國完成吸收20萬私營企業主入黨的目標，之後每年的吸收人數將逐漸增加。〈1〉

這項被學者視為大膽創新的容許資本家入黨的主張，是偏離中共歷屆黨章規定中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的傳統的。中共曾經在建黨之初受列寧時代的布爾什維克黨影響，定下中共這個性質，雖然在以後的全面反蔣鬥爭中並未發揮此種工人階級先鋒作用，但長期間也只是接受工人、農民、軍人、知識份子、革命份子入黨。在中共的傳統觀念中，私營企業主實即是資本家，是「革命的對象」。據明報引述「左派人士」說，江澤民89年8月曾在《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建設的通知》中指出：「私營企業主同工人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剝削與被剝削的關係，不能吸收私營企業主入黨」。〈2〉

再舉出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以前的意見為例。他去年在《黨建研究》中撰文表示，「要明確私營企業主不能入黨」。「從所有制性質上看，私營企業主作為生產資料私人佔有者，與廣大員工存在著僱傭關係，按照黨章規定不能吸收他們入黨。否則，將會模糊黨的性質和工人階級先鋒隊的標準，產生『誰是富有者誰就具備入黨條件』的誤導」。他還指出：如果允許企業主入黨，當中有些人還可能利用經濟實力操縱基層選舉、控制基層組織，甚至產生嚴重的政治後果。（但在江澤民發表這項主張之後，張德江又急忙在《求是》雜誌為文表示，要「貫徹江澤民同志關於吸收新黨員標準的新概括」了！）〈3〉

一方面，北京已出現幾份「萬言書」，反對讓資本家入黨，指責江澤民的「七一講話」是極其重大的政治錯誤事件，違背了中共黨章的基本原則和規定，說西方媒體認為中共終於開始變成資本家的共產黨了。

另一方面，官方的宣傳機器則全面開動，傳播讚美江澤民的頌詞。例如：前面引述的李君如說，「這是理論上的重大突破和創新」。「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吳登雲則認為，江的講話體現了中共「這樣一種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新覺醒」。〈4〉這就是說，中共已因此而從過去的錯誤中覺醒過來！

江澤民在這個講話發表之前，曾嚴厲批評反對者，當局則在7月初下令不許再發表反對文章，也不作爭論。中宣部長丁關根部署進一步深入宣傳江這個講話，同時強調絕不給違背中央精神的錯誤言論提供傳播渠道。〈5〉這反映出中共黨內已產生重大歧見，黨領導層要用行政手段壓制那些不同意見的發表。這也就很快地暴露出江澤民「講話」中如下宣稱的虛偽：必須「充分發揚黨內民主」，「要切實保障黨員的民主權利，拓寬黨內民主渠道」；「凡屬黨組織工作中的重大問題都應力求組織廣大黨員討論，充分聽取各種意見。」「講話」除了重彈那些假大空爛調之外，並沒有提出切實進行政治民主改革的新意。

在「七一講話」之前，黨內外有不少人士都提出要進行民主政制改革。據說是江澤民心腹幕僚的劉吉（現任社科院副院長）公開呼籲：中國在政治體制上要有大動作，首先應該從黨內民主著手。「黨內民主首先需要黨的高級領導集團民主」，「如果不，又如何領導全黨民主？」〈6〉但「七一講話」對此全無回應，反之，卻要求黨員「堅決抵制西方多黨制的影響」。即：堅決維護一黨獨裁；同時又在行動上繼續扼殺黨內外反對者的意見。

資本主義勢力大增的反映

江澤民這些意見，其實是資本主義勢力在中國大增的反映，顯示他們要遷就後者的壓力和要求，承認企業家在決定中國前途的問題上擔當愈來愈重要的角色。據估算，私營企業現時已佔中國1萬億美元國內生產總值的20%以上，並僱用數以百萬計的國企下崗工人。

爲了爭取加入世貿，中共去年開始要求國有企業退出150種以上的競爭性工業行業，而讓給非國有的企業去發展。據估計，未來數年內，私營或外資公司、中外合資企業，將可能會與國企「平分天下」。

又爲了推行市場經濟，中共逐步取消了過去幾乎全部商品和服務項目由國家規定價格的做法，減少到今天只保留了13種（類）。〈7〉這顯示，除了這13種（類）之外，全部商品和服務項目的價格都由市場來決定，而不是按照人民需要和利益來規定價格了，這又是屈從於資本主義者壓力的結果。

像上述這樣的政策措施的推行，結果便導致中國日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化，代表資本主義的勢力便急速增長。

除了黨外的資產階級要求擁有影響作用的壓力外，中共黨內已從改革開放中大獲利益而變成資產者的黨員壓力，也在日益增加。據中共估計，已有11萬黨員從

商，大部份是入黨以後開始從商的。〈8〉單是浙江省，據上引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在《求是》的文章說，浙江省自改革開放以來，全省黨員隊伍的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也有來自其他社會階層的優秀份子」。目前浙江省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從業的黨員已達15萬5千多人，其中私營企業主黨員5,574名。「這些領域的黨員隊伍不斷擴大」。〈9〉

再由於中產階級人數的劇增，他們加入中共的人數也會大增。據國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徐漳河指出，未來5年中國的中產階級階層人數將達到2億人。〈10〉其結果，也將大大改變中共的黨員成份，影響中共的意識形態、路線、政策。

自從改革開放以來，過去紅極一時的「無產階級是領導階級」這句即使是名不符實的口頭禪也已日益少見報章或領導人講話所提起，到後來幾乎已音沉響絕；工人階級在國家政治和經濟中的影響力和地位已日益衰微，不像過去那樣被「重視」（實應說是利用）了。至於「中共是工人階級先鋒隊」這一性質，也早已越來越不純正和名不符實。

在中共建黨80週年這一天，終於由它的總書記江澤民公開提出讓資產階級、中產階級等社會階級階層名正言順地成爲中共組織構成的一部份，亦即可擁有影響黨理論、決策的權利和作用，從而揭開了中共的「工人階級先鋒隊」的假面具！而由於中共上中層的親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及既得利益等因素，明年秋的中共十六大將會修改黨章中的這個規定，連「違反黨章規定」這點反對理由也將被打消，使中共從名義到實際都變成社會黨那樣的政黨！

2001年8月10日

註釋：

〈1〉 〈2〉7月23日《明報》報道。

〈3〉 7月27日《明報》。

〈4〉 新華社北京7月1日電。

〈5〉 7月23日、31日《明報》。

〈6〉 6月27日《蘋果日報》。

〈7〉 7月12日《文匯報》。

〈8〉 7月3日《文匯報》。

〈9〉 7月27日《明報》特稿。

〈10〉7月21日《明報》。

西部大開發的意圖和難題

張開

西部的概貌

在新中國建立半個世紀之後，中共中央才宣佈要大開發西部地區。西部包括11個省和重慶市，偏遠鄉村、山區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西部在中國解放後一直得不到國家重視，國家對該地區的豐富資源雖盡量獲取，但給予的幫助（如投入的開發資金）卻遠比對東部的為少，以致西部的基礎建設很缺乏，交通運輸十分不便，經濟發展緩慢；在全國的經濟比重，到1995年只佔14.5%，而其人口約3億6千萬，卻佔全國人口總數近3成，土地面積更佔近6成。

也因為如此，在西部農村，尤其是山區，人民的收入增長很慢，生活依然十分困苦。儘管官方公佈，近兩年的西部城鎮居民平均「實際年收入」，有的省是4500元（人民幣，下同），有些省是5、6千元；但依照過去官方數字的虛假浮誇經驗，相信上述的數字也會遠高於實際的收入，特別是農村和山區人民的實際收入。香港無線電視台今年6月11日晚播出的《鏗鏘集》《農民怨》報道：一位由上海到雲南的志願工作者江健對記者說，他所見到的雲南墨江縣山區人民的月收入只有1、2百元（亦即年收入只有2千多或遠低於2千元）。6月29日的《蘋果日報》也報道：貴州省農民去年人均收入僅得1300港元。這些數字應該是可信的。

中共的開發目的和實際距離

中共前幾年提出開發中西部，近兩年則著重於西部大開發，為的是什麼？朱鎔基在去年3月向人大會議報告：「這對於擴大內需、推動國民經濟持續增長，對於促進各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對於加強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和鞏固邊防，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他所描繪的理想是十分美麗的，但距離實際卻非常遙遠。在這幅畫圖的背後，還隱藏著現時存在的許多困難和問題。重要的有：

一、經濟方面。由於中國的市場經濟化，前幾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對中國市場的衝擊是不少的；更由於市場經濟下生產的無計劃，許多商品滯銷積壓，使中

共提出要增加國內消費來促銷。它注意到西部幾億人口這個龐大市場，於是加強了開發西部的意念。但西部人口的普遍貧困，失業者多，購買力弱，擴大不了多少銷路；只有國家大量增加對該地區的投資，進行各種建設，幫助人民就業和得到較高收入，然後才較多可能在西部擴大內需。

二、政治方面。由於中央長期對西部的多取少助等錯誤政策，加劇了西部的困難，使西部不能早日脫離落後、貧困的苦境；加上大漢族主義和不讓當地的少數民族享有民族自決權（甚至連中共所稱的「自治」權也名不符實），這就造成了少數民族的不滿，和他們與漢族及北京中央的紛爭，爭取少數民族獨立的行動便時有所聞。最近發生的疆獨組織「東土耳其斯坦信息中心」對港商訪問團的嚴重警告、香港漢基學校旅遊車因被視為得到優待而激發西安民眾大騷亂、西安市長安大學的漢族與維吾爾族學生的衝突等事件，都反映出民族間矛盾、紛爭的持續。上述的東土中心還認為，引入外商投資，必定出現大規模移民潮，不但令新疆「漢化」，阻礙當地民主發展，更會引發維吾爾族人民與外來漢人之間的衝突。如果這個意見是反映相當多的少數民族人民的，則北京所期望的開發能「加強民族團結」，便可能有相反的結果。

三、社會方面。中國社會的不安情勢正日益嚴重化。由中共組織部部長曾慶紅領導的一個研究小組撰寫的報告（題目是：《2000-2001年中國調查報告：新形勢下人民內部矛盾研究》）指出：大陸民眾對於社會和經濟不平等、官員貪腐以及幹部對人民漠不關心的情況已愈來愈憤怒；經濟、種族和宗教衝突日增，大型示威抗議活動正逐漸向各地擴散，參與人數動輒上萬。共黨幹部與民眾關係呈現緊張，衝突日增。除了社會、經濟不平等和官員普遍貪腐引起民眾不滿之外，農村與城市、東部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大，也已到了「警戒線」邊緣。「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可能帶來更多的危險和壓力，預期接下來會再爆發一些群眾事件，嚴重影響社會穩定，甚至影響改革開放的和平進行。」^{<1>}中國近期的嚴重情勢連中共也已這樣承認，並把上述這份報告公開銷售，這是過去所罕見的。中共高層應已早就認識到這

些危機，因此提出開發西部，作為解決危機的對策之一；但如果期望這樣就能「維護社會穩定」，那便近乎空想了。

當前中國最尖銳而令人民最不滿意的是失業問題。中國社科院發表的《中國城鎮居民社會心態的調查報告》顯示：內地居民認為影響社會穩定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就業壓力、腐敗嚴重、貧富懸殊、社會風氣敗壞等。最不滿城市就業問題的人，佔了受訪人數的88.9%。^{<2>}

這表明城鎮失業問題的嚴重及人民的憤懣情況。在農村，所謂「過剩勞動力」的失業、半失業的農民人數也有1億多。這些都增加了社會無法穩定的因素。

應如何開發西部

西部、西北部、西南部和中部等地區，都應該而且必要進行開發，以善用自然資源，把它們從地下蘊藏變成現實物質力量，發展經濟，改善各地區人民的生活。但開發的權力，必須掌握在全體人民手中，由人民實行真正的當家作主。國家必須動用充足的財力物力，去支持開發的需要。而要做到這些，又必須中國有真正民主的政制，消除所有官僚的政治、經濟特權，否則的話——舉具體事例來說——即使國家發行幾千億元的國債，去幫助西部的基礎設施，但由於黨政地方幹部貪污腐敗，化公為私，中飽私囊（這已是長期以來的普遍現實），西部大開發將給予他們以極好機會，國家投入的資金將會被官員大量侵吞、浪費，許多「建設」會成為「豆腐渣工程」，參與建設的農民工被高度壓榨，得不到足夠的收入去改善生活，他們的購買力也就不能提高；加上官員恃勢橫行等因素所造成的社會壞風氣，也會影響人口大量移民到西部，以及東部和海外商人對西部的投資興趣。

而且，中國高層領導人對國家應該動用充分的財力物力去支持開發西部的實際行動，又是言行不符的。

江澤民在97年9月的中共十五大報告中提出：「國家要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量，優先安排基礎設施和資源開發項目，……鼓勵國內外投資者到中西部投資。」

雖然如此宣佈，1999年，國家對東部（只佔全國面積1成多）、中部和西部的固定資產投資分別為：12940億元、4773億元和3446億元；2000年則分別為14015億元、5432億元和3943億元^{<3>}。2001年「國家將在繼續搞好去年開工的西部十大建設的同

時，計劃再開工12個重點工程項目，總投資約3千億元^{<4>}。如果這就是今年對西部的總投資，那就是不增反減了。

儘管國家對東部的固定資產投資長期來都遠遠高於西部，其經濟發展已大大拋離了西部，兩者的貧富懸殊已日益擴大，但在中共中央決定西部大開發之後，東、西部的投資金額仍然相差如此巨大。由此可反映出中共特別偏重東部的一貫做法仍未根本改變，「促進各地區經濟協調發展」依然是假大空話。

特別優惠外資

中共的開發西部做法，是把希望寄託在外來投資上面，特別是依靠資本家的投資。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主任曾培炎2000年3月向人大會議報告：「加快西部開發，應主要運用市場機制，吸引各方面資金。」這主要是吸引港、台及其他國家的資金，部份是東部的私企和國企的投資。由此推卸了國家所應負的重大責任。

國家為鼓勵外商到西部開發，最近宣佈了將在西部實施3項新稅務優惠，減收所得稅，免收一些進口技術設備貨品的關稅。

而為了爭取外商到本省投資，各省領導人盡力作出更優惠的承諾。例如，陝西省長程安東承諾替投資者解決難題，包括併購國有企業時毋須承擔舊債；取消一批涉外行政性收費項目，統一收費及簡化審批程序；若跨國公司到陝西投資，省政府會幫忙解決舊債、剝離非經營資產及安置多餘人手（這即是使許多原有工人失業，而由中國當局負起責任）。駐港中資公司可將國企資產無償劃轉。有西部訪問團的港商表示，這些承諾的條件「好得難以置信」。^{<5>}

新疆制定出台了的鼓勵投資的特別優惠政策，包括：允許外資企業和自治區內外企業共同享有新疆資源開發權、市場佔有權、政策受益權；對於建設用地，可按行政劃撥方式提供；對於按租賃或出讓方式取得國有土地使用權的，在租金或出讓金方面給予優惠。^{<6>}

但在上述報道後第4天，同一《文匯報》又刊載了中國國土資源部土地利用司司長胡志智的向外發言：國有土地資產是國有財產，不容流失。「一些地方政府為了吸引投資，經常在招商中推出減免地價等『優惠條件』。國土資源部將根據國務部下發的《國務院關於加強國有土地資產管理的通知》採取措施堅決杜絕這一現象。」「低於最低基準價出讓土地的行為將被視為犯罪。」^{<7>}

這個聲明很可能是針對一些地方負責人為討好外商而肆意犧牲國有財產而發出的。這反映出中央或國務院與各地方負責人之間的政策上矛盾、混亂。

不過，中共高層要以極大代價吸引外商投資的意向，看來是難以改變的。

中國目前每年平均引進外資427億美元。至今年4月底止，中國已批准外商投資企業37.1萬家，外商投資合同總額6969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3595億美元。加入世貿後，中國每年吸引的外商投資總額將超過500億美元。〈8〉

香港在大陸的投資，至今年4月底止，共有1742億美元，佔了外資實際投資總額的48%（與90年代相比，比重已明顯下降）。

在江澤民突然召集香港一批超級富豪到北京會談之後，後者們便在香港政府帶頭下組織了一個西部訪問團，進行投資考察，掀起了西部大開發的「俾面派對」熱潮。

朱鎔基在接見這個訪問團時說，港商如果能夠抓緊西部的機遇，便有機會躋身香港十大富豪之列。這意味中央答允外商可以大量奪取西部人民的豐富資源，高度壓榨西部人民的廉價勞動力，以迅速而驚人地增加外商、尤其是港商的私人財富（倘非如此，便不可能晉身億萬富豪之列）。有些港人和報章稱對西部的考察和投資為「西征」，恰恰反映出人們的征服者心態，要像歷史上中原的帝王派大軍「西征」，以壓服當地少數民族的任何反抗（後者當時被醜化為未開化的蠻夷），而在今天，則是要以資本主義的殘酷剝削手法壓榨他們。

開發的惡果和意義

西部大開發的重大惡果之一，是西部社會、經濟更加資本主義化，原有的國有企業將退處劣勢，資本主義私人企業則佔居優勢。兩者的這種力量對比趨勢將會有增無已。

重慶的例子足以表明這種發展趨勢。該市市長包敘定提出，「十五」期間，重慶市將大力發展民營經濟（即資本主義私營經濟的遮羞代用語，像以前用「待業」來代替「失業」一樣），5年內民營經濟佔重慶市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將由現在的37%提升為53%，要實現這一戰略目標，重慶市的民營企業每年必須按18%的高速度遞增發展。〈9〉

由此可知，西部大開發將意味中國向資本主義化更加邁進。

大開發的另一惡果是破壞生態環境，造成各種污

染，毒害居民的健康。中國東部和珠江三角洲的教訓應該成為殷鑒：由於工業的迅速發展，人們只圖追求更多的利潤，而不顧生態環境的保持，致令水污染嚴重影響城鄉的食水衛生和供應；傾注有毒廢物和污水等，使海洋遭到污染；焚化工業廢料產生出有毒物質（例如二噁英等）損害環境和人民健康，等等。開發西部也必將帶來生態環境的污染和破壞，重蹈其他地區開發的覆轍。

舉例來看：新疆建設兵團打算發展印染業，連一些港商都表示擔心會破壞生態環境，尤其因為新疆依賴地下水，這個後果不堪設想；但兵團司令認為發展事在必行〈10〉。面對著外商投資引來日益劇烈地爭奪利潤的市場競爭，人們勢必不顧西部的生態環境，而會造成災難性的破壞。上述的新疆建設兵團司令的堅決表示，便可得到證明。

上述的惡果，是由於當局一心依賴資本家及採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方法，即容許以單純追求利潤為目的，而不是著眼於社會和人民的利益，不是把計劃、民主和市場作用有機地結合起來，因而造成的。主要責任應由中國當局負起。

2001年6月28日

註釋：

- <1> 引自6月6日《蘋果日報》李怡專欄的《騷動頻起》和6月4日《東方日報》。
- <2> 5月3日《明報》載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日發表的《2001年社會藍皮書》。
- <3> 2000年的數字，引自當年的國家統計局統計公報；1999年的數字，則根據上述公報所列的增加百分比推算得。
- <4> 這是國家計委、國務院西部開發辦副主任李子彬所「透露」的，5月12日《文匯報》根據中新網成都11日消息加以報道。
- <5> 5月21日《明報》。
- <6> 5月29日《文匯報》記者報道。
- <7> 6月2日《文匯報》載新華社北京6月1日電。
- <8> 新華社6月19日電。
- <9> 4月25日《文匯報》特稿。
- <10> 5月30日《明報》。

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為軍國主義鋪路

高島義一

以「正式參拜靖國神社」為盟約的小泉純一郎當上日本首相，儘管遭到包括中國、韓國、朝鮮等國政府的強烈批評，仍然沒有改變態度，反而要求亞洲各國改變對「參拜靖國神社」的情緒。小泉詭辯道：「參拜靖國神社，悼念那些為了今日的和平與繁榮為國捐軀的人，正是為了不再發生戰爭」。那麼，靖國神社到底是什麼性質的設施呢？

1869年，明治政府為了悼念自從幕府末期到明治維新為政府而戰死的屬員，設立了「東京招魂社」，這就是靖國神社的前身。自從日本政府第一次海外侵略的出兵台灣（1874年）到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4年日俄戰爭，此設施改名為靖國神社，變為顯彰為天皇制國家戰死的軍人的中心設施。

一般的神社由民間經營，在內務省統一註冊，但靖國神社一直都屬於陸軍省與海軍省管轄，其「神官」也由陸、海軍省任免。其悼念的「神」或「英靈」包括從明治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為止死亡的246餘萬軍人，卻沒有包括平民等「一般戰死者」，連戰時被動員起來的「鐵血勤皇隊」民兵、學徒後備隊也沒有被包括。當然包括東條英機等13名A級戰犯在內的戰爭決策人都作為「昭和殉難者」被祭奠在設施內。

把天皇祭為活神的靖國神社通過各種禮儀、活動、展覽，就這樣成為國家政權動員民眾全面投入侵略戰爭的工具。在這個國家神道觀下，無論是社會主義者還是宗教徒，都因為拒絕參拜遭到迫害。

戰後，憲法明確規定思想、信教的自由（第19條）、政教分離的原則（第20條）。靖國神社按照宗教法人法註冊為宗教團體，小泉以一國的首相名義參拜此一宗教團體設施，當然是違反憲法的。實際上，連自民黨政府在1980年11月也不得不承認：正式參拜不能否定違憲的疑問。

實際上，1991年1月仙台高等裁判所、1992年福岡高等裁判所、大阪高等裁判所，以及1997年日本最高裁判所都確定，日本首相等以政府官員資格參拜靖國神社是違反憲法的。

但對於日本統治集團而言，正式參拜靖國神社是形成能從事戰爭的「普通國家」體制的不可缺少的國民公眾意識的第一步。以改憲為目標的中曾根康弘在1985年8月15日首次以首相身份參拜之前就揚言：「如果我們國民不感謝那些為國捐軀的人，誰再會為國赴難？」時為法務大臣、自民黨靖國神社委員會委員長的奧野誠亮元（其本人戰前為秘密警察官僚，參與銷毀秘密文件的行徑使許多戰犯漏網）更明確地叫囂：「自衛隊戰士的靈魂祭奠在靖國神社，我們作為國家的代表卻不能代表國家去悼念，怎麼可能維持國家的獨立呢？」

小泉這樣急不及待，除了日本社會的進一步右傾、軍國主義動向外，也是出於在「全球化」浪潮下日本經濟的進一步衰退激化了社會矛盾，日本統治集團急於找到通向戰爭的途徑來轉移國內危機。這就是參拜靖國神社的危險本質。

（趙京2001年7月24日摘譯自新時代社《橋樑》周刊2001年7月16日第1690號）



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的胡說

(韓國) 韓勝東

徹底美化日本對亞洲的侵略

從2001年起，很有可能必須改寫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其後的世界史，因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很有可能出版由政府審查、認可的文件——它將告訴人們迄今所述的歷史都是被強迫和為洗腦而捏造的。

這份送審的文件的一部份內容如下：「同日（日本的海軍機動隊突襲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國太平洋艦隊的1941年12月8日），日本的陸軍部隊在馬來半島登陸，開始了和英國軍隊的戰鬥。他們以騎自行車的銀輪部隊打頭，穿行在熱帶叢林和橡膠林中，一邊擊退英軍，一邊向新加坡快速推進；用五十五天縱貫馬來半島約一千公里，登陸後僅七十天，於翌年二月攻陷新加坡，使英國對東南亞的統治最終崩潰。在菲律賓、印尼、緬甸等地，日軍也擊敗了美國、荷蘭、英國的軍隊。結果，開戰約一百天，諸戰生輝，走向大的勝利。這是因為有遭受了數百年白人殖民統治痛苦的當地人的合作而成為了可能的勝利。這一日本初戰的勝利，大大地喚起了東南亞和印度以至非洲的人們爭取獨立的理想和勇氣。」

文件中還寫道：亞洲的人們似乎至今仍將為了世界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而與弱小民族求大同存小異地團結合作，同西方帝國主義列強作了流血鬥爭的日本誤解為侵略者；把為了「培育他們的爭取獨立的理想和勇氣」而來的日本人看作是與西方人同樣的帝國主義者，可謂是背恩忘德。

印度獨立之父不是東條英機嗎？

這文件說：英語單詞「aggression」本還有首先進攻啦、侵犯啦等意思的；東京審判時，日本方面提出了那場戰爭是有正當理由的自衛戰爭的反駁意見，但是因為聯合國方面誇張地將那單詞翻譯成表示入侵、掠奪之意的侵略，而「廣泛地造成了日本幹了所謂如同強盜一樣的行為的唯一印象」，令人感到遺憾。

文章繼續寫道：「日軍支援了印度獨立運動，使印度國民軍得以誕生。在新加坡舉行的閱兵式上，獨立運動的鬥士錢德拉·鮑斯發佈了向祖國進軍的宣言。『前進！向著德里！』暴風雨般的呼喊聲在國民軍

將士和兩萬人的印度民眾、有色人種的觀眾中回翔不絕。」「印度的法律家巴拉巴依·德薩依說，『印度的獨立托日本的福而早了三十年』。」

「儘管有歐美殖民統治的既得利益者的抗日游擊活動，但是日本還是承認了歐美帝國數百年中也沒有承認的緬甸、菲律賓、印度、越南、柬埔寨、老撾等國的獨立。」

「就這樣，以日軍的南進為轉機，日本戰敗後，從亞洲到非洲，各個歐洲殖民地國家的獨立浪潮不斷興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地圖完全改變了。1960年的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殖民地獨立宣言。它與大東亞會議的共同宣言的宗旨是一樣的。」

所謂的大東亞會議是1943年11月在東京由日本首相東條英機主持召開的會議。中華民國（南京政府）代表汪精衛，滿洲國、泰國、菲律賓、緬甸的代表和自由印度臨時政府的錢德拉·鮑斯等參加了會議。文件認為如果說該會議的共同宣言和十七年後的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有著共同的宗旨的話，那麼東條英機在戰敗後，作為蒙受了無法洗掉的污名的甲級戰犯，被處以死刑一事就顯然無疑地是錯了。不僅如此，將南京政府和滿洲國政府定為親日傀儡政府，稱泰國、菲律賓、緬甸的與會者為日本的吹喇叭抬轎者，不是也錯了嗎？而且駭人聽聞的是，如果現在能這樣想的話，那麼印度獨立之父就不是聖雄甘地和賈瓦哈拉爾·尼赫魯，實際上不就是東條英機了嗎？

別國進行了大屠殺；只有日本是人道的

這文件還說：有一種說法，認為日軍進軍東南亞，勢如破竹，初戰告捷，不是因為有「當地人的合作」，而是因為隨著1939年9月德國侵犯波蘭，整個歐洲陷入戰亂，英、法等東南亞殖民地的宗主國不得不將兵力集中到歐洲，這種講法當然是荒唐的；另一種說法，稱菲律賓是遭受了突襲珍珠港打擊的美國不得不讓給日本的，也是不對的；還有種說法，指責事前就已周密地考慮到事態發展可能性的日本，一邊乘虛闖入無主之地，一邊搶奪了殖民地居民自主填補權力真空的機會，那講法才是其所謂的專橫不講理，強加於人。

錯誤還不止這種程度。「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戰

末期，蘇聯軍隊侵入滿洲，不斷殺害、搶劫、強姦日本普通市民，還將包括俘虜在內的六十萬日本人強行帶到西伯利亞從事條件殘酷的勞動，導致其中大約10%的人死亡。這分明是戰爭犯罪。可是對戰勝國的戰爭犯罪大都予以默認，而對戰敗國日本的真假不明的戰爭犯罪，沒有充分審理，就隨心所欲地判處了一千人（乙、丙級戰犯）以上的士兵和軍官死刑。」

「納粹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對猶太人恣意進行大屠殺，這是同戰爭相吻合的作為個別國家的意圖而策劃、實施了的集體犯罪，殺害了普通百姓中的六百萬猶太人，兩百萬波蘭的知識分子、比上述人數更多的蘇聯人、五十萬吉卜賽（婦）人，並對殘疾人和病人處以了安樂死。」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各地仍進行了種族屠殺。蘇聯的斯大林殺戮了國內數千萬稱為資產階級的富裕階級的人；中國的毛澤東也同樣規模地只以所謂思想不同為由處死了自己的國民；柬埔寨的波爾布特慘殺了本國八百萬國民中的二百五十萬。」

由此，下面的記述就很重要了：「日本雖然已和德國結為同盟，但根據反對種族歧視的國家方針救護了猶太人。1938年3月，陸軍少將樋口紀一郎給了路過而往西伯利亞逃亡的猶太人難民援助，允許他們進入滿洲國；第二年11月，駐立陶宛的領事杉原千畝給猶太難民六千人發了簽證，開放了路經日本的避難途徑。」

隨後，該文件還指責了美軍從東京大空襲開始的對日本的大都市進行的不分對象的轟炸和投擲原子彈轟炸廣島、長崎，並在質問那不是「戰爭犯罪」嗎、不是「種族屠殺」嗎之後寫道：「美國向不是軍人的、無抵抗的普通日本市民的頭上降雨、澆水般地投擲燃燒彈，殺死、殺傷了七八十萬人；兼做確認原子彈爆炸效果的實驗而在一瞬間殺死、殺傷了三十萬市民。」

日本只是「殺害了若干人」而已（？）

這文件中有日本連猶太人都給予了援救的記載，但他們進行了大屠殺的記載卻一處也沒有；由此給人的印象是，別的地方關於日本在侵略中國大陸的過程中屠殺了三千萬以上的居民的諸多記載不但不是事實，反而是美國等「道不合的諸國」為了掩蓋自己任意屠殺了許多人的劣跡而強加給人道主義的化身——日本的。

不過，該文件中只有一處有這樣一段仍可謂是利於他的相關文字：「但是進行戰爭而沒有一點戰爭犯罪的國家是沒有的，當然日本也不例外。然而對於

戰爭犯罪，如果能夠問做了公正的處罰嗎，而回答是的話，則有話要說。」執筆者們不像介紹其它各國那樣列舉具體事例，只以「日本也不例外」一語做結，而沒言及詳情。可是為了談論「做了公正的處罰嗎」那個問題，該文件中冗長地羅列了各國的各種各樣的戰爭犯罪的狀況，並抗辯道，為什麼對屠殺了數百萬、數千萬人的別國的戰爭犯罪者就那樣放任，而對東條英機式的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的支援者們處以了重罰。

該文件中唯一一處例外，載有與日軍的戰爭犯罪有關的事項，那就是以「南京事件」為小標題的關於所謂的南京大屠殺的談論；全文如下：

「這個東京審判的法庭認定日軍在1937年攻克南京的戰役中殺害了二十萬以上的中國人。」

可是依據當時的資料的話，那時的南京的人口只有二十萬，竟然會在日軍攻打它一個月後增加到二十五萬人。除了那點之外，這一事件的疑問點還有許多，現今還在持續進行論爭。因為是在戰爭中，就算是有殺害了若干人的情形，但也不是對猶太人進行大屠殺那樣一種類型的情況。」看！文件中承認的日軍的罪過實在只有這唯一一次，那也不過是「殺害了若干人」而已；中國歪曲和誇張了這樣的真實真是不好。

不用說，軍中慰安婦也好，強迫其殖民地的人民新取、改用日本式的姓名也好，該文件中都沒有提及。提到徵兵、徵用、則說主要是以日本人為對象而實施的，但周到地在句尾的括弧中附加了「在台灣、朝鮮也實行了」的說明。該文件還說，可是，將這麼微小的罪過誇張成驚人的犯罪似的，而對於真正地進行了大屠殺的人們卻不予處罰，那全是戰勝國，其中特別是美國的如下的陰謀所致。

「進行東京審判的同時，GHQ（日本佔領軍總司令部）實行了意在將戰爭罪惡感徹底地灌輸到日本人心中的《War Guilt Information Program》（戰爭犯罪宣傳計劃），動員了報紙、雜誌、電台、電影等所有的媒體。強調了日本的戰爭是不正當的、日本人的舉動是殘酷的。那樣一來，在東京審判中提出的真假不明的可疑之處有了很多。」

所謂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

該文件稱：如果追問美國的過錯的話是無止境的。「大東亞戰爭」本身是因為美國的強橫兇暴，日本沒有辦法才開始的「為了自由的戰爭」。「1938年，近衛文^廣呂總理發表了建設東亞新秩序的聲明，暗示了創建把日本、滿洲、中國合併在一起的經濟圈的

設想——後來發展為建立包括東南亞在內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口號。一面叫嚷著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一面卻來壓制日本的美國，決不允許日本構築獨自的經濟圈。」這成了美日直接戰爭的導火線。只要美國不阻礙的話，日本就應該是能夠建成「獨自的經濟圈——大東亞共榮圈」的吧…。

上述的文件是日本的右翼團體「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今年4月送交日本文部省審查的初中社會科歷史教科書的一部分內容，最近由裡面的人秘密地傳了出來。如果被審查通過的話，從2001年4月起，各校就能夠選定、使用了。小學的教科書從2001年、高中的教科書從2003年起改變；如果早的話，在明年春天，從小學的教科書起，讓國家作為正確合理的歷史觀的一部分正式認定，這樣一類的教科書就能登場了。自民黨施加了讓其通過的壓力，文部省內流傳著聽任若干外人插手是准許它通過吧的話。審定是在10月，事實上結束於文部省發表「檢定意見」的同時。如果明年3月最終是否合格的通知發出的話，各地方自治體在6、7月份就能選定教科書了。從最近的日本社會的氣氛來看，如果這教科書被審查通過的話，很多學校選用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不僅擁有由兩百多人組成的「國會議員歷史教科書問題思考會」等政界、財界、學界、言論界、宗教界的廣泛的後援勢力，而且確實地保有展開選用特定教科書運動的組織。那絕對不是脫離了社會的一般潮流的許多弱小集團的突出行動，並已通過暢銷書《國民的歷史》和電影《自尊——命運的瞬間》等完成了實習的過程。今後，不管第一線的學校將有多少選用這教科書，無論如何更關心的問題是文部省會否蓋上審定通過的印章。審定通過的話，意味著國家正式承認那樣表述的看法。

在這本教科書中，日本干脆地認錯的意思，從頭到尾即使是一次也沒有。實際上，要問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壞嗎、比美國好嗎，或者歐洲帝國壞嗎等，是沒有意義的問題。從稱他們為想盡可能地佔據東亞這個飼料盆而互相衝突以至開戰的帝國主義者們這一點來看，無論哪一個也不能說是更壞更好些。而該教科書將這一點作為了又一個迴避責任的手段，這樣寫道：

「戰爭是悲劇。但是在戰爭中區分善與惡是困難的。不能夠說哪一方是正義的，哪一方是非正義的。國家和國家圍繞國家利益鬥爭到最後，依靠政治不能解決時，作為最終手段而發動的就是戰爭。當時的日本人沒有選擇不與美軍作戰就承認失敗的方式。」

日本究竟往哪裡去

前面的說法似乎正確，但不像話。不能區分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的主張，在不擇手段地拼命掠奪、彼此一樣雙手被鮮血染紅的帝國主義者之間是通用的。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使朝鮮的東學黨農民起義被挫敗，最終使朝鮮國家自身被日本強行吞併；並相對於與西方列強形式相同地在中國搶奪而言，還單方面地一邊蹂躪中國，一邊殺戮了數千萬中國人。要是說這些戰爭中沒有善與惡、正義與非正義之分的話，稱其為胡說並不過份。日本帝國主義是徹頭徹尾的害人者，是罪惡的、非正義的。

該教科書的執筆者們，為了掩蓋其「胡說」的本質，將所有的責任硬推給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的同志們，攻擊他們而把日本喬裝打扮為遭受西方列強侵略之苦的殖民地各國的民族解放者。但儘管那樣，其自相矛盾和狡猾還是馬上就暴露了出來。對於同一個受害者，日本一方面標榜自己「培育了他們的爭取獨立的理想和希望」，另一方面卻又粉碎了他們的爭取完全獨立的理想和希望。

這些右翼分子們的固執在煽動狂熱的民族主義這一點上表現得很嚴重。他們至今還在這樣教育讀初中的孩子們：「阿留申群島的阿圖島上，只有兩千人的日軍守備隊面對兩萬美軍這個敵手一步也沒有退讓。在彈藥、糧食的補給中斷後，最後剩下的大約三百名傷兵，一面強撐軀體前行，哪怕破爛不堪的衣褲拖地，一面揮舞著日本刀從容不迫地逼近美軍，戰至犧牲。就是這樣，從南太平洋經新畿內亞到太平洋中部的馬里亞納群島的各島，日軍都不投降而先後戰死」；「美軍官兵對進行自殺式攻擊的它（神風特攻隊）先似乎是感到害怕，後來則懷有敬意似的」；「（雖然神風攻擊的戰法不足取，但是）為了保衛家鄉的親人，保衛日本，這樣的犧牲也在所不辭」。

該教科書中還引用了戰死在沖繩的一個十九歲的神風特攻隊隊員寫給在故鄉的妹妹的信中的話：「安子妹：…每天，因為空襲想來很可怕吧。哥哥我決心報仇，決心衝入那大得超過想像的航空母艦。那時候，…請為哥哥我感到高興。」

日本究竟在往哪裡去？這樣的問題已經被提起過無數次，得到了又一個很明快的回答嗎？

（馮克瑞於美國Old Dominion大學轉譯自日本《橋樑》周刊第1649號，改動了總標題；該文原載韓國2000年8月24日發行的第322號《韓同胞21》雜誌，係由該刊駐東京特派員韓勝東（音譯）所寫。）

美軍必須立即停止挑釁性偵察活動 並撤出東亞太平洋地區

沖繩反基地鬥爭組織委員會（日本）

（以下是關於4月1日發生的中國軍機墜落、美機在海南島緊急著陸的美國海軍EP3型偵察機事件，沖繩反基地鬥爭組織委員會遞交給了美國駐日本國大使館的抗議信，原文如下：）

剛剛過去的4月1日，發生了從沖繩的嘉手納基地起飛的美國海軍EP3型偵察機，在中國海南島附近的海洋面上空，與進行警戒、監視飛行的中國軍隊的戰鬥機觸撞，一架中國軍機墜落，美國偵察機也有損傷而在海南島緊急著陸的事件。美機及其機員4人立即被中方扣留。雖然美外交談判的結果，美方機組人員全部獲釋並到達關島，但是問題依然沒有解決。美中間的軍事緊張導致戰爭的危險性清清楚楚地顯示在我們眼前。

此次撞機事故的直接原因尚未清楚，關於它的狀態也還沒判明。但是我們認為，事態的核心是從在沖繩的基地起飛的美軍偵察機在貼近中國領空的地方經常性地反覆進行針對中國的軍事偵察行動，而不是美中的哪一方造成了觸撞的失誤。

發生觸撞的美軍EP3型飛機所屬的VQ1（艦隊用空中偵察第1中隊），在美國西海岸設置了根據地，在（日本）青森の三澤基地維持著分遣隊，在嘉手納基地常駐有偵察機。從沖繩的嘉手納基地起飛的EP3型偵察機，沿著台灣海峽飛越中國領空，執行了收取電波以掌握中國軍隊動向和軍事基地狀況的任務。裝備了旁聽通信裝置的EP3還進行了解析電話、因特網中通信情報的竊聽活動。其對象不只是軍事情報，還有被認定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的抵抗組織的活動等。我們擔心，美軍的這種諜報活動，決不是為了世界的「和平」而進行的，而是為了將對於其所稱的「流氓國家」、「破壞性游擊隊」等對象的恣意的攻擊正當化，不是在起著加劇緊張和武力紛爭的作用嗎？

我們強烈反對以這次的撞機事故為契機，向台灣提供最新的「神盾級」軍艦，和加速將台灣納入TMD（戰區導彈防禦計劃）的動向。如此蓄意製造台灣海峽的緊張的所有舉動都是不能允許的。

我們抗議美軍從在沖繩和「本土」的基地出發進行的挑釁性偵察活動，要求其立即停止這種行動並撤走偵察部隊，同時大幅度削減在東亞、太平洋地區散佈戰爭火種的根源的美軍的存在，跨出全面撤退美軍的第一步。

2001年4月2日
致美利堅合眾國駐日本國大使館

（馮克瑞2001年5月12、13日於美國Old Dominion大學譯自日本時代社同年4月23日發行的第1679號《橋樑》周刊第4頁。）



從天安門到熱諾亞

趙京

這一天來得太晚，但它畢竟到來了。

自從1989年中國民眾在天安門廣場奮起抗爭一黨專制並遭到卑鄙的鎮壓後，人類社會經歷了急劇的倒退與反動。在幾乎所有的政權穩定的國度裡，無論是華盛頓、北京，還是東京、平壤，民眾的政治、經濟權利都遭到統治集團的進一步剝奪。這個歷史性復辟過程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生活在發達工業國度的民眾被其統治集團蒙騙與操縱，沒有配合在一黨專制下抗爭的中國、蘇聯等民眾，使得我們原初的爭取社會主義民主的普遍鬥爭在國內被鎮壓或在西方被收買成為一小撮替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效勞的政治人物的工具。

我們沒有必要顧及那些背棄了自國民眾寄人籬下的叛逃者們的靈魂出賣，因為他們畢竟對社會傷害不大。但是，那些靠民眾力量爬上政權的「精英」，當政時面對的只是「國際社會」（即西方社會、或美國）的統治集團的「支援」（或壓力）、缺乏西方社會民眾的聲援，只能扮演買辦的角色。儘管他們遲早會被民眾拋棄，但已經出賣或瓦解了祖國，為害深重。米諾舍維奇企圖以民族主義逃脫此命運，招來了帝國主義的直接軍事轟炸，他本人也被囚捕。

每年一度的西方發達七國首腦會議本來只是一個不具政治色彩的「富人俱樂部」，但因天安門事件立即轉換為世界「民主主義」的政治宣言立法者。1989年東道主密特朗宣判北京專制政權沒有未來，西方的廣大民眾都以為這七國的制度才是人類未來的唯一選擇。在中國受到制裁、蘇聯瓦解與聯合國機能癱瘓的過去12年裡，七國首腦（加上後來的歐盟與俄羅斯首腦）會議迅速轉變成決定全球命運的、推行全球資本主義化的世界買辦「政府」。它的主要效勞顧客是以美國為基地的跨國集團。

2000年在沖繩召開的八國首腦只遭到輕微的抗議，因為在美國軍事佔領和日本政治、經濟支配下的沖繩民眾被迫招待直接決定他們命運的強權。面對2001年7月聚集到熱諾亞（Genoa）的20萬歐洲民

眾，八國首腦以及主流媒介把他們描繪成「暴亂的無政府主義者」與「請求免除第三世界債務的天主教徒」，表明這些世界支配者們只準備兩種答覆：開槍鎮壓或「開恩施與」。實際上，歐洲民眾的如此大規模的、明確宣示的政治示威，主要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化的擴張已經威脅到他們自身直接的生活利益了。

天安門的示威顯出中國民眾對於自身命運的另一種可能性的追求，熱諾亞的抗爭意義在於西方發達國度的民眾正面地以直接行動拒絕各國買辦統治集團對人類前途的威脅。這對於中國等追求民主化鬥爭的民眾提供了一個新的鼓勵方向，可以阻止中國的民主化運動像過去那樣被西方國家統治集團輕易地利用。

在經歷中國被納入世界貿易組織、江澤民集團公開宣稱「三個代表」（要點是「代表最先進生產力」、即西方跨國公司利益）、公開歡迎資本家加入共產黨等一系列有關國家本質的轉變後，北京的執政者夢想擠身成為「九國首腦」之一員的願望也流露出來。日本等歡迎中國加入以便「教育」中國不至於與西方公開衝突。我們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有時有二流的英語詞句、概念（如「絆腳石」、trouble makers形容李登輝，似乎華盛頓本身沒有意圖干涉台灣事務），有時用一流的日語直接與日本外相談判、喪失立場（如就小泉參拜靖國神社問題用詞不妥被日本政界利用），生怕西方強權以為北京當局不理解西方、發生誤會。

可以期望，西方國家民眾的抗爭會越來越持久、擴展，中國民眾抗爭的政治方向也會更加成熟，來反對共同的敵人——各國的統治集團，為整個人類的前途帶來希望。

2001年8月5日



以巴衝突——阿拉伯人為自決權而戰鬥

巴勒特

2001年1月3日晨，消瘦的阿拉法特出現在白宮，面對著記者和攝影記者。阿拉法特承認，他已有條件地接受克林頓總統提出的「華盛頓方案」，用以與以色列商談解決「定居點」問題。這是否能結束長達四個月的暴力糾紛，猶待觀察。

根據《紐約時報》1月3日所刊消息，巴勒斯坦駐華盛頓代表拉赫曼告訴美聯社記者說：「阿拉法特以積極態度提出我們的立場，而克林頓總統也接受了，現在只需把這些條件轉交給以色列首相巴拉克。這是克林頓政府在其任期即將結束時所做的最後努力，以期取得外交上的勝利。而巴拉克呢，同樣也是他首相任期的最後日子，他正面臨著2月大選，他的對手是狂熱的種族主義者沙龍。」

巴拉克政府也只是示意「有條件地」接受克林頓方案；他派遣資深外交官吉利德·謝爾（Gilead Sher）前往華盛頓去會見國務院官員。以色列的反響已包含在致美國國家安全顧問伯格的文件中，但內容迄未公開。

克林頓的「和平」方案

12月20日，克林頓政府提出方案，力圖解決這歷經半個世紀之久的衝突。具有重大意義的倒是：人們所關心的解決衝突方案，能否在以色列大選之前達成協議，如果沙龍贏得大選勝利，毫無疑義，和平前景定將破滅，而新一輪暴力衝突必將開始。

克林頓的方案是極有利於以色列的，這就用不著驚異了。而對阿拉伯人僅有某些讓步；方案規定建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它擁有西岸95%領土以及全部加沙地帶，並要求以色列撤出若干孤立的猶太人定居點；然而較大的猶太復國主義定居區將被合併到以色列，而在別的地方給巴勒斯坦人以補償。方案還讓巴勒斯坦控制著阿拉伯人聚居區，例如在東耶路撒冷、在聖廟山頂（哈拉姆——沙利夫山）地區以及兩個伊斯蘭聖地（即洛克殿宇和阿克薩清真寺）等。以色列仍然控制著西部城區（west wall），看來他們還有

權開發哈拉姆——沙利夫山（即聖廟山）下的土地。

對以色列的讓步遠更重大。巴勒斯坦雖然有了自己的國家，但其國際邊界均受以色列的控制，包括約旦河西岸與約旦之間的全部邊界線。巴勒斯坦領地內各不同部份的連接受到了限制：約旦河西岸與加沙地帶不是連接在一起的，同時出讓給以色列的地段幾乎把約旦河西岸分隔成兩片了，僅在該地區的南部和北部之間留出唯一的交叉連接點。甚至在耶路撒冷城內，阿拉伯人聚居點本應在巴勒斯坦轄區內，現在是彼此隔開的，成了猶太復國主義的汪洋大海中的幾個阿拉伯孤島，儘管情況如此惡劣，但這還不是克林頓方案中最糟糕的條文。

巴勒斯坦人的回歸家園權

克林頓的建議中還規定，巴勒斯坦難民及其後裔必須放棄返回家園權，而他們的家園今天都還位於以色列國的邊界以內。這對於所有巴勒斯坦難民來說，是最殘酷也最令人沮喪的事，因為為了被趕出去的阿拉伯人回歸家園鬥爭，為重新得到被搶走的財產的鬥爭，是自1948年以來就是阿拉伯人反對以色列鬥爭中的核心問題。即使克林頓和巴拉克能迫使阿拉法特在這方面作出讓步，但巴勒斯坦人民將永遠不會接受的。如果巴勒斯坦難民及其後裔沒有得到返回家園權的保證，和平就不可能實現。

早期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口號是：「沒有人民的土地，是不給沒有土地的人民的。」這是一個瀰天大謊。巴勒斯坦儘管是土耳其人的一個省，而不是一個獨立國家，然而這塊土地上有居民，而且已經形成了社會和經濟。它的人民是有足以自豪的悠久歷史的。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猶太人和猶太教在伊斯蘭世界裡所享有的生活遠比在基督教世界裡優裕得多。

然而，我們必須了解的是：猶太教和伊斯蘭教作為宗教，並無多大區別：伊斯蘭教接受猶太經學及其預言為聖書，並相信真主阿拉（Allah）與基督教的耶和華是同一個人。穆斯林甚至相信基督耶穌和聖徒

約翰都是先知。因此，猶太人改信伊斯蘭教是一件易事。因為他們實際上沒有什麼損失。實際上，最初接受穆罕默德神諭的是猶太人，他們那時居住在穆罕默德被放逐出麥加後的避難地——梅迪尼城（Medineh）。有些歷史學家堅信，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是羅馬時代定居在巴勒斯坦猶太人的真正後裔。

十九世紀後期，當歐洲最初一批猶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時，受到阿拉伯居民的歡迎。只當猶太復國主義者團體開始購進外地主的土地，並把在這些土地上勞動的阿拉伯佃農驅逐出去，衝突之火便開始點燃起來了。當猶太復國主義者蓄意要建立獨一無二的猶太國家的意圖越益明顯起來時，可怕的流血戰爭周期便開始了，一直繼續到今天。

二戰後的中東外交所鑄成的惡果便是臭名昭著的1947年「分隔方案」，這與今天克林頓的方案是非常相似的。但這樣的分隔方案過去行不通，今天也同樣行不通。1948年5月，戰爭形成了，猶太復國主義者在這次戰爭中，按照分隔方案，攫取的土地幾乎是劃歸他們土地的兩倍，他們採取的戰略政策，就是巴爾幹半島衝突中取名為「種族清洗」政策。大規模暴力行為以及隨之而起的大恐怖，把數以千計的阿拉伯人趕到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鄰近的阿拉伯國家去。他們的家園和財產都被新成立的以色列國沒收了，並分配給猶太人，這批猶太人儘管大部份是從歐洲來的，但他們得到了「回歸權」。這批猶太民族與巴勒斯坦沒有連繫至少已有2000年了，據歷史學家確立的結論說，猶太民族分散在整個地中海地區的日期，應推算到公元76年羅馬人鎮壓猶太反叛者的若干世紀之前。

以色列猶太人決無權建立獨一無二的國家

猶太復國主義者拒絕巴勒斯坦人要求遣返他們的難民及其後裔，理由是：這樣做，在以色列領地內的阿拉伯少數，不久後便會變為阿拉伯人多數，無論如何，這會破壞了以色列人作為「猶太國」的性質。他們這樣說並沒有錯。儘管過去幾個世紀來犯下了反猶太民族的罪行，然而獨一無二的猶太國的觀念，是徹頭徹尾的種族主義，自然會受到為和平、正義世界而奮鬥的每一個人的反對。

社會主義者是在這種形勢下支持民族自決權的，

這形勢就是：一個民族在另一個具有更大優勢的國家統治下，便沒有獨立發展的機會了。然而，這樣的民族自決權僅是通向未來世界的一塊踏腳石，在未來世界中，固有的民族、種族以及宗教分歧，不再妨害各民族在和平友好環境中共同生活和共同工作。例如，在我們的國家裡，只要我們的社會仍然受到白種人的統治，我們從不期望不同的民族會融為一體，因此，我們支持美籍黑人自決權的號召，但拒絕徹頭徹尾屬於白種人的種族歧視的自決權。

儘管過去幾世紀以來，猶太人遭受了很大災難，不錯，這是事實，但他們的受壓迫是在歐洲基督徒統治下發生的，而不是受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壓迫。在猶太復國主義者實行殖民主義之前，巴勒斯坦也有猶太人社區如同各阿拉伯國家裡都有猶太人社區一樣。在20世紀，特別在20世紀後半葉，絕大多數以色列人由他們自己作出選擇定居在巴勒斯坦。

與以色列的情況真正相似的，不是像庫爾德斯坦或西藏那樣的被壓迫民族，而是同1994年種族隔離政策終止前的南非相類似的。白人南非在社會中要比猶太復國主義者有深得多的根基，正因此，黑人南非力圖創立一個各民族可以共存的新社會。種族隔離這一政策，是想把壓迫者白人的自決與被壓迫者非洲人的自決等同起來，而猶太復國主義者採取同樣方法，號召把獨一無二的國家，只交給最近移民到巴勒斯坦的那些人，他們用武力奪取土地，把數以千計的原有居民趕出他們的家園，並把那些已降為二等公民的人流放出去。可以肯定，凡一切違反正義的和平協議都將以失敗告終。

巴勒斯坦領導人為什麼考慮克林頓方案？

很可能有人會問：阿拉法特到底在想些什麼呢？他怎麼可能去考慮或同意如此不公正的解決辦法呢？尤其是這麼大量的年輕或年老的阿拉伯人，其中年輕人佔多數，為了解放自己家園而獻去了他們的生命，阿拉法特怎麼還會去考慮呢？因此，譴責阿拉法特為「背叛者」是顯而易見的事。而且很多人已經這樣去做了。但目前巴勒斯坦領導人對擺在面前的任務處理不當，儘管是事實，但這並不因為阿拉法特及其夥伴們不忠誠於巴勒斯坦解放事業。阿拉法特已經70歲了，他把一生中的40年傾注在為解放他的人民的戰鬥

中。他像納爾遜、曼德拉、柯里、亞當斯以及其他民族主義戰士們一樣，贏得了人民愛戴和效忠，這正是因為他全心全意地獻身於他的人民及人民的願望。正因此，他的人民願意原諒他的錯誤及其政治綱領的缺陷性，這一點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阿拉法特並不是簡單地代表他個人，儘管他力圖要領導整個巴勒斯坦民族，他不能逃避經濟現實和階級區分，這種情況已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佔據優勢。此外，他也不能忽視國際力量關係，不論在政治上，或經濟上的國際力量關係，會給阿拉伯人的鬥爭帶來決定性影響，自1967年戰爭以來的33年中，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經濟基礎設施已經形成，特別在1993年奧斯陸協議簽訂以來，為創建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的基礎也已加速發展了，這個獨立國有自己的保安部隊，交通和運輸體系。巴解組織的領袖中，吸收一些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人物，他們從日益加強的經濟發展中獲得利益。巴勒斯坦商人正在尋求國際投資，以期巴勒斯坦在融合到全球經濟化過程中有獲利的機會。此外，一種象徵性的經濟關係，在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為一方，和以以色列為另一方之間已經展開了。以色列人要依賴阿拉伯勞工去幹必要的工作，這是猶太復國主義者所不願幹的，而阿拉伯人則要依賴以色列人才能找到工作，獲得收入。

然而，戰爭持續下去，不但會破壞物資和服務工作的相互交流，而且還會瓦解從90年代已經奠定的作為一個獨立國的物質基礎的所有進程。阿拉伯的以及國際的工商業家，他們現在有利可圖，而且還預見到未來有更大的機會，這些工商業家，要求阿拉法特要言聽計從了。

在巴勒斯坦，顯而易見，以阿拉伯勞動人民與小農為一方，以巴勒斯坦與國際工商業家為另一方，其間存在著利益衝突。銀行家和投資家們的願望是要保持和解，才能使金錢源源而來，但這卻不能同要求解放家園、重新獲得財產以及與家人團聚的工農願望求得調和。純樸的民族主義概念不可能走出這條死胡同，而巴解組織或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反對派（如哈瑪斯）也無法提供任何出路。

雖然這樣的領導尚未出現：他們提出一份巴勒斯坦阿拉伯綱領，把民族解放和社會革命結合起來，但

只要能斷然地集中提出民族主義要求，使全體巴勒斯坦難民回歸家園，而且要用行動來證明：在為民族解放作不妥協鬥爭與為了短期利益而拋棄人民的綱領之間的鮮明對照，那麼上述領導組織的出現就更容易得多了。不論是巴解組織發出聲討檄文，也不論是空洞抽象地號召成立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政黨，都不能說服人民跟隨新的領導，特別是因為一個新的領導組織必須在鬥爭中產生，在鬥爭中來證明自己。只有等到這個時候，即廣大群眾行動起來了，要求回歸家園權，要求市民權，要求在以色列領地內的阿拉伯人有更好的醫療照顧，學校和住房權的鬥爭必須繼續下去時，那時全世界堅信和平與正義的人們，就會參加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共同鬥爭中去，要求終止以色列的軍事行為，撤出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帶的猶太定居點。

2001年4月7日是國際抗議以色列佔領日

國際範圍內的阿拉伯人，伊斯蘭教徒和其他組織已經走到一起，支持反猶太復國主義，並於2001年4月7日組織一次國際性共同示威遊行。方案正在制訂中，要在規定的那一天在紐約舉行上街遊行及集會。巴勒斯坦回歸家園權委員會的國際網址是 <http://www.a/awda.org>。這個委員會將在美國協調工作，帶領廣大群眾上街，要求巴勒斯坦難民回歸家園權決不能取消。他們的鬥爭是值得勞工運動以及一切為爭取正義、和平世界到來的人們的大力支持的。

（蕭明節譯自《勞工旗幟》2001年第1期）



沙龍——以色列精神文明的真面目

蔚然摘譯

許多人認為，選舉沙龍為總理是以色列歷史的轉捩點，預示「和平進程」的終結。

在阿拉伯世界，沙龍被叫做「貝魯特的屠夫」。五十年來，他參與多次屠殺事件，使巴勒斯坦人擔驚受怕，而自由以色列人則厭惡地把他視為魔鬼的化身。

聖經啓示錄的偏見是顯而易見的。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西蒙·佩雷斯卻以此偏見宣稱以色列工黨甘心情願在沙龍領導下為「民族聯合政府」服務。佩雷斯在選舉前曾被吹捧為代替總理阿胡德·巴拉克的「左派」。他作為外交部長為沙龍的國際政策辯護。

另一位工黨成員，前將軍賓阿明·本·阿里阿澤出任國防部長，他負責執行沙龍對佔領區的政策。據4月4日《耶路撒冷郵報》說：「本·阿里澤……打算拋開胡羅白，而使用大棒迫使巴勒斯坦人回到談判桌上來。」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沙龍政府是以色列第一個使用不帶公文包的阿拉伯人，工黨的薩拉赫·塔里夫充任政府的部長。不祥的徵兆是屬於極右莫里德黨的將軍里哈溫·澤阿維出任旅遊部長。他的政策就是把阿拉伯人全部從以色列驅逐出去。

這一切是不足為奇的。沙龍同以色列前總理並沒有什麼不同。他具有一副真正的以色列政治文化面孔。不管以色列和平進程中出現的這些令人深感痛苦的情況，但這清楚地表明，沙龍之獲得選舉的勝利，乃係由於他過去的可疑歷史。

大家都記得，沙龍是以色列工人運動湧現出來的一位人物。他在半集體化的農村中成長，他早年的教父是工黨最初的領導人大衛·本·居里安和工黨總部首腦莫舍·達揚，他的政治上的良師益友則是工黨總理依扎克·拉賓。他的政治經歷就像拉賓。他是工黨阿赫杜德·哈阿沃達派的積極份子，該派曾組成以色列前國家帕爾瑪赫突擊隊。

早在50年代，沙龍被任命為一個軍事聯隊的首腦，擔負追捕和殺害越過邊界的巴勒斯坦人。在臭名

昭著的101聯隊的業績中，有對約旦奇比亞的突然襲擊，使70個家庭被炸毀，還在熟睡中的老百姓全部死於非命。在沙龍的指揮下，聯隊對約旦和埃及進行過多次突然襲擊，其野蠻殘暴使人感到可惡可憎。

在1970-71年間，他對平定加沙難民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的聯隊硬是用推土機把許多民房鏟平為坦克開路，並開展一場屠殺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成員的戰爭，使不計其數的巴勒斯坦人死於非命，就是他的業績。

他被撤銷參謀部長首腦的職務後進入政界，起先充當過贊同和巴勒斯坦人、及建立巴勒斯坦國的支持者進行協商的角色。但，對沙龍來說，這個巴勒斯坦國並不在巴勒斯坦地區。正如所說：「約旦就是巴勒斯坦」。在1982年黎巴嫩戰爭中，他的戰略目的就是要把巴勒斯坦人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區趕出去，並推倒哈舍米特政權，而代之以一個百依百順的巴勒斯坦國。

1975年，他參加競選不久，便離開國會，被任命為當時的國防部長拉賓的特別顧問。1981年，梅納赫姆·貝根任命沙龍為國防部長，曾引起一場爭論，他的一位助手說過：「在沙龍未曾擔任參謀部首腦時，我就說，不讓他當參謀長，就得讓他當國防部長。現在我要說，不讓他當國防部長，就得讓他當總理。」

1982年黎巴嫩戰爭時期，他的行蹤詭秘。經調查，官方證實他對貝魯特的沙帕拉和薩提拉難民營許多巴勒斯坦人遭到殺害負有「間接責任」。

以上這些事實都是以色列選民們所熟知的。他們所以要選沙龍，是表示他們對國際的主張和對巴拉克的政治謀略的蔑視。

巴拉克選舉失敗是因為在十八個月裡，他與大部份選民疏遠了。在第一次選舉時，他獲得以色列95%巴勒斯坦公民的選票。他宣告要組成國會中一個不依靠阿拉伯人的純粹猶太人的聯盟。像早年的所有總理一樣，他要任用一個阿拉伯人為內閣大臣，他失敗

了。他曾允許警察頭目在加利利（那裡多數是阿拉伯人）製造一起騷亂來反對阿拉伯人政治活動家。在此事件中，好些國會議員因揭發他而受到恐嚇。他監督過對巴勒斯坦公民的屠殺；其中14人未經調查，也不准辯護便被殺害了。在這次選舉中，他所得的阿拉伯人選票下跌到1%，這就不奇怪了。

前所未有的對選舉的冷淡表明多數以色列猶太人同阿拉伯人一樣，拒絕在兩個戰犯中去進行選擇。

巴拉克曾作出和平的承諾，他在1999年曾獲得競選勝利的中央區，這次也失去許多選票。他建議的所謂「讓步」，遠未能獲得巴勒斯坦人的支持，而在許多以色列人看來，卻是「讓步」得太多了。而且，他強迫許多選舉人爲以色列的「正義」服兵役，這引起了反抗。譬如說，在1999年從俄國回來的猶太移民，許多人曾支持過巴拉克，卻轉而支持沙龍。但，沙龍的勝利並不祇是巴拉克失去選票的結果。

通過競選，沙龍把自己裝扮成一個慈祥的老人，卻要加強實力地位來謀取和平。多數以色列人對衝突導致暴力行爲、孤立和經濟衰退已經厭倦，他們清楚地知道，沙龍祇是個以色列的戴高樂一類的人物，當

他提出巴勒斯坦人不能拒絕的建議時，說起話來是很強硬的。

總之，人們記得，貝根右翼政府曾同埃及達成過和平，全部從西奈半島撤離，並拆除了新的定居點。但，對於沙龍來說，比之巴拉克、內塔尼阿胡或拉賓，這樣的樂觀前景，是更不可能有了。

除非中東地區的力量平衡有了改變，以色列政府提出的任何交易條件，都是巴勒斯坦人不能夠和不願意接受的。沙龍和他的八個工黨部長們在他的密室裡可以指望用他的方式和方法繼續實施他的朋友巴拉克和拉賓的政策，而他的「約旦就是巴勒斯坦」的觀點，和旅遊部長澤阿維的「換地」援助相結合，那才是他所最爲關注的。

把沙龍視爲獨一無二的惡棍，和祇把注意力集中在反對他過去的戰犯歷史，那是不夠的。沙龍的地位，是過去52年來以色列的所作所爲邏輯發展的結果。這才是衝突的緣由，而不是現領導人的個性使然。

（蔚然摘譯自《社會主義展望》2001年3月號）

世界社會論壇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開

圖森特

一次大膽的冒險行動，將反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運動的數百名代表，從世界各地帶到了巴西南部的大城市——阿雷格里港。

這次運動的目標是要繪製一幅「可走不同選擇道路」的藍圖，並達成一份有關優先動員時間表的協議。與此同時，另外一批旨在把世界繼續推向受資本統治的代表們，正在瑞士達沃斯集會。

總之，爲了反對在達沃斯召開的世界經濟論壇（WEF），世界社會論壇（WSF）肯定地指出建設另一類世界是可能的。

這次大膽的冒險行動，不論從那一種觀點來看，都是如願以償了。例如：規模相當大的反新自由主義

全球化運動，派出很多代表來參加論壇；表現出多種綱領的趨向一致；辯論是高質量的；通過了相互補充的三個宣言——社會運動宣言、議會代表宣言以及地方政府代表宣言。最後是全球性的媒體採訪的廣泛傳佈。因此，在達沃斯召開的WEF和在阿雷格里港召開的WSF正在有系統地表明，這兩個論壇是人類面臨兩種基本選擇的象徵。

世界社會論壇（WSF）的召開，是由巴西組織委員會精心準備了一年多之後的高潮，這個組委會的成員有：各社會運動（MST無土地者運動、CUT工會聯盟等等）以及其他民間組織。委員會還有系統地與其他各大洲的運動取得聯繫，其中有ATTAC，南半球中

心、ACDTM、Jubile Sad以及法國雜誌《外交界》。

巴西南里奧格蘭州州政府（有1千萬居民）及其首府阿雷格里的市議會（有130萬居民）由於有了工人黨的領導，積極支持WSF（論壇）。

2001年1月25日，WSF開幕，約有4000名代表參加。主要的演說（如工人黨州長、前工會領袖O·杜特拉的演說便是其中一例）以及高質的文化成果，為這短短五天會議定下了基調。其中文化成果之一體現在今天土著民族和非洲後裔的鬥爭中，這鬥爭是黑奴解放偉大門爭的繼續。

開幕以後，WSF代表們聚集在市中心，舉行了約有一萬人參加的盛大示威遊行，其主題是「為生活而進軍」、「建設另一類世界是可能的」，這次示威遊行以露天音樂會而告結束。

從1月26日到1月29日，每天上午同時舉行的有4次重大辯論會，參加人數從400到900不等，總數是16次辯論會，集中討論重大的社會主題，繪製出可走不同選擇道路的藍圖。

每天下午是小組專題討論會——4天內有近360次小組專題討論會，都是由各運動主持者自己組織的。繼小組專題討論會之後還有著名人士在大會上的演辭，如工人黨領袖盧拉（Lula）、墨西哥民主革命黨領袖C·卡德納斯、法國農民聯盟的J·波維。

除此之外，有一個世界議會論壇（有350名當選代表參加），還有一個由阿雷格里港新市長塔索·根羅領導的世界市政論壇。有1000多人參與的國際青年營、土著民族營以及無土地運動的許多活動家。

世界社會論壇（WSF）於2001年1月30日閉幕了，大會通過決議：將在2002年與世界經濟論壇（WEF）在達沃斯集會的同一天，再次在阿雷格里港召開會議。

各社會運動趨向一致化

自從1998年10月「投資多邊協議」（MAL）的無效，1999年12月在西雅圖召開WTO會議的失敗，以及2000年9月在布拉格召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年會遭到慘敗以來，阿雷格里港的WSF（世界社會論壇）又邁出一大步，即加強了各社會運動之間的趨同形勢，力圖滿足人類的基本要求。

過去幾年中，WSF發起的所有行動，都有利於各個有影響力的社會運動走向共同立場，這些社會運動包括巴西的CUT，韓國的KCTU，阿根廷的CTA，南非的CUSATU等等工會組織、農民運動和市民運動，如ATTAC；土著民族運動，如厄瓜多爾的CONAIE、墨西哥的Zapatistas；世界婦女進軍等；國際網絡站，如南半球中心、ATTAC、CADTM，歐洲人進軍等；還包括四無社會運動（無報紙、無家、無職業、無土地）；環境保護者運動、和平主義運動等等。

各社會運動之間的協議要點，都可在阿雷格里港WSF（論壇）上通過的宣言中找到。

若干重大問題仍然是辯論中的主題，其中有1. 是否有必要「廢除」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會和世貿組織，或有可能加以改革？2. 周邊各國應否為停付債務而進行鬥爭，或通過協商談判而毋需採取這一措施？

務請注意兩個論壇的鮮明對比：在達沃斯，可以看到四周用鐵線網包圍起來，數百名警察、士兵負責保護工作；而在阿雷格里港則向一切把人類利益放在一切其他利益之上的人們開放。在達沃斯，沉淪在奢侈、浪費的燈紅酒綠中，而在阿雷格里港則是人的尊嚴壓倒一切。在達沃斯，呈現出正統性、合法性的危機，而在阿雷格里港則是追求另一類選擇的新世界。

WSF引來了不平凡的媒體採訪，有近500記者到會採訪（遠比達沃斯的記者多）。包括最狂熱的資本統治維護者CNN（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在內的記者們意識到：公眾輿論的轉折點已經來到了，不可數計的世界公民反對新自由主義的進攻已經掀起了。

（黃申譯自《勞工旗幟》2001年第1期）



遠左派在英國大選冒升

索內特

英國不民主的選舉制度，使新工黨在最近的大選得到「壓倒性」的勝利。在2001年6月7日舉行的大選裡，新工黨僅得到42%投票者的支持，或25%有資格選舉者的支持。英國大選今次的投票率只有59%，是繼1918年以來最低的投票率。至於乾脆不作選民登記的人數，更是不知凡幾。大部份不作選民登記的人士，屬於窮人和黑人。而新工黨在這次的得票，比起1997年，也少了3百萬張選票。按上述數字來看，貝理雅理應不能被授權作任何事，甚至不該組成政府。不過，從英國的選舉制度來看，他卻是繼1980年代撒切爾掌權以來，最強有力的首相。

比起以前的工黨政府，貝理雅更偏重英國的中產階級，這在今次選舉裡，更尤其突出。所以，同樣的，新工黨獲得比歷屆工黨政府少得多的工人選票，愈來愈代表了英國資本界的主流。在工黨傳統的工人選票重鎮，棄權不投票的比率最高。

保守黨所得的選舉結果，可謂最惡劣不過。在上屆選舉裡，貝理雅在國會內已經沒有多少反對派對手；而在這一次，更是少之又少。

新工黨是社會民主派裡的極右派

新工黨代表著歐洲社會民主派裡的極右派，也是推行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表表者。貝理雅清晰地表示，今後將再進一步把新自由主義擴大推行。來臨中的攻勢，將是對公營部門更進一步、巨細無遺的展開進攻。在醫療、公共交通和教育部門內，更進一步推行私營化；其中，對醫院的管理工作，即將交予私營。用貝理雅的說法，這場攻勢，將「無思想顧慮」。當然，指導貝理雅的思想，以此作出驅動力的，就是名叫「市場」的意識形態。

新政府面對的最大難題，將會是加入歐元，使貨幣單一化的課題。貝理雅在競選時主張英國加入歐元，但時至現在，問題卻開始含糊。新工黨就有關於加入歐元的時機這一點，是有分歧的。與此同時，英國的資本界，則希望愈快加入愈好。

那麼，左派在英國這次選舉裡，有什麼收穫呢？

對於建立取代貝理雅的另類出路，又有什麼看法？

很清楚的是，「社會主義聯線」這次決定高調參選，從競選過程及投票結果來看，都是言之成立的。「社會主義聯線」之有需要參選的迫切性，不在於貝理雅向右邊再進一步，而卻是在於由這一步而向左派開路的空間。不追隨貝理雅的工黨會員和投票者，需要有一個社會主義另類選擇來填補空檔。而當然，事情不能在一次投票裡便發生轉機。

選民轉向左派

新聞媒體就這次低投票率而鼓吹選民冷漠說；這個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

大多數棄權不投票者，乃是對現存政黨和政制喪失了信心；這些人中，有許多是進行抗議以反對全球化的年青人。這一類選票，可以稱為抗議票。在抗議票中，可以分為兩大類；最大的一類是棄權票，另一類是投給自由民主黨、綠黨和分別由「社會主義聯線」和「社會主義工黨」所代表的左派。

綠黨在這次選舉裡得到歷來最高的票數；在他們參選的145個選區裡，平均得到2.25%選票。在綠黨最強選區裡，得到的票數有9.3%之強。所以，綠黨第一次有足夠的投票率，得回競選按金。

左派方面，「蘇格蘭社會黨」得到最大收穫。這個黨在今年5月和蘇格蘭的「社會主義工人黨」合併，成為了蘇格蘭多年來第一個統一起來的社會主義組織。該黨在蘇格蘭的72個選區裡，一共得到平均3.1%的投票率，其中，在格拉斯哥的得票達到9.98%。這個結果，將有助於它在蘇格蘭國會選舉中得到更多席位，因為蘇格蘭的國會是行比例代表制。「蘇格蘭社會黨」的成就，為蘇格蘭以至全英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復甦推前一步，成為榜樣。

在英國和威爾斯，左派的選票由「社會主義聯線」和「社會主義工黨」分庭抗禮。前者是第一次參選，後者在1997年首次參選。在得票表現上，前者比後者輕微稍勝，在92個選區裡，共得55635票，得票1.75%；後者得54880票。總體結果表示，左派

（包括「蘇格蘭社會黨」）全部得票180,000張，這在戰後的英國，是獨一無二的表現，而比起1997年的得票，更激增了3倍。在極左派方面來說，「社會主義聯線」的得票，也是戰後最佳，比起英國共產黨在1950年的得票率更多。由於「社會主義聯線」是首次競選，許多可能投予一票的人，或許仍然持觀望態度；反之，也有許多人懷著給工黨第二次機會的想法，未能轉變投票態度。所以，在下次大選裡，隨著「社會主義聯線」有更充裕的時間進行組織，它在將來的得票會是更多。

今次英國大選的結果，顯示了有更多人向社會主義尋出路，而且準備投予一票，把「社會主義聯線」推上英國的政治地帶。

在工會內，有愈來愈多左派討論左派間的統一。而在消防員工會，更首次改變規章，容許工會資助競

選反對工黨的政黨。上述這些發展，是由「社會主義聯線參選」而引起。「社會主義聯線」顯然將要從今次選舉裡汲取教訓，檢討本組織的強項弱項。

一項對英國這次大選結果所顯示的社會趨勢的研究，有以下的總結：

「工黨在工人區的選區裡的失票，平均有4%……其中有些失票，似乎是史無前例的轉投向極左派……以極左派的表現來看，看來工黨之向右轉，再沒有引起其內部形成左派的危險了。」

從這個總結來看，對左派是極為正面的。「社會主義聯線」已經發動運動，反對工黨連任政府。在聯線內部，也開始討論到怎樣加強組織，展開活動，以鞏固既有的成就，為下次大選鋪路。

（史丹摘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6月號）

資本主義的瘋狂帶來瘋牛症

加里

〔本文作者是「西班牙聯合左派」內的「另類左派」的領袖，也是西班牙工會聯會「工人委員會」的生態委員會的委員〕

瘋牛症成為了歐盟境內的食物不安全的象徵。新聞媒體很少談到，瘋牛症是源出自工業國家特有的農業生產模式，以及這個模式是怎樣產生。農業的急激「全球化」既是瘋牛症從動物向人體迅速擴散的根源，也是造成肺結核等疾病捲土重來的成因，同樣地，也是造成動物間的病菌傳佈如口蹄症的罪魁禍首。

瘋牛症之所以受到新聞媒體和歐盟的高度關注，乃是因為它有大量擴散的危險，而並非因為已經有90人死亡。

很清楚的是，有關健康和食物安全的憂慮，只是重重問題的一斑。公眾對於其餘方面，仍是不得其詳。用動物廢料製成高蛋白質的複合飼料的瘋狂飼養法，使歐盟在經濟、農業和生態方面陷入了十分嚴峻

的危機。這個危機突出了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已經落入窮巷，使政策的可行性乃至政策的本質受到質疑。

瘋牛症的發源

在1980年代之前，動物界內的海綿體腦炎，在物種之間不會互相傳播。這個疾病只出現在羊類，而人類吃食染病的羊肉不會有不良後果。其後，由羊類乃至牛類混合而成的牛糧飼料，開始把病體從動物間散播。牛類進化史迄今，第一次被餵食有動物廢料的飼料，從而產生了令人類受害的瘋牛症。這個病症引致神經失常，破壞神經、營養機能系，破壞記憶力，最終導致死亡。這個病能夠在動物或人體內長期潛伏，病發是突如其來，沒有先兆。

通過食物、某些醫療或手術過程、在化妝品中使用動物脂肪等（動物脂肪也用來製成香菸濾咀、火腿、以至疫苗），物種之間的界限已經打破無遺，人類現在已經受到污染。跨越物種的傳染媒介，威力所

向披靡，無法控制。

瘋牛症在人類間可以通過血液傳播。至於傳病的媒介，是染病動物的變型蛋白質。變型蛋白質使正常的蛋白質變異，使酵母無法令之解體。變型蛋白質耐熱，不畏酒精、消炎劑、紫外光及各種化學分解法，等等。由於它不同於過濾性病毒，不帶基因物質，所以不會引起身體內的免疫系統的反應，致使很難在活人身上探出它的存在。變型蛋白質的帶病媒介埋在泥土之下也將活上多年，為現世和後代構成危險。

瘋牛症的成因

瘋牛症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對於「保衛公共健康協會聯合會」來說，瘋牛症是源出自「對全球化過程的控制不善造成的結果；這個全球化的經濟關係把經濟利益放在首位，罔顧保護健康的權利，同時讓國家放棄管制和調節的角色，任由牛群飼料受污染，讓受污染的動物向全歐洲散播。」

這樣的一種經濟利益，是和用複合飼料以使動物快速肥大的大型農業生產線的模式緊密相聯。在這種模式下，畜牧業和農業分離，使飼養成為半工業經濟，用高生產、高利潤來取代可維繫發展的視野。

資本主義全球化使上述生產模式的最壞方面大大發揮，使這個模式的漏洞突出無遺，使問題的浮現和增殖加速。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使問題更進一步深化和特殊化。

歐盟在技術和入口農業產品方面對美國的依賴，及跨國企業大豆市場的控制，在在使歐盟的依賴性增加。在人工飼料方面，歐盟在植物蛋白質方面的需求，有高達70%的赤字。與此同時，由於歐盟同意限制含油植物的種植量，這使到歐洲經濟共同體在過去和美國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及英國國會通過的貝理雅協議，在在俱使歐盟束手束腳，更增加了依賴性。

所以，到了撒切爾時代的高峰，一些目空一切的工業家，在毫無制肘下，開始用動物內臟製造廉價的飼料，使家畜成了自相殘食的食肉獸。當瘋牛症是這種飼料的成因為人所知之後，以英國為首的一些歐盟國家試圖在歐盟內禁用複合飼料，但同時也恬不知恥的向第三世界，尤其是其中最貧窮的國家，推銷這種飼料。

瘋牛症在歐盟的養畜業內迅速蔓延，在英國尤其嚴重。從1996年屠宰的4.8百萬頭動物裡，共發現18萬宗瘋牛症。至於未能探查到的瘋牛症，則是不計其

數。

據《自然》雜誌估計，共有95萬頭染有瘋牛症的牛隻，在過去4年裡進入了食物環。在製造漢堡飽、餡餅、肉準備的行業內，同時也用上動物肉臟和肉末。據歐盟的科學委員會計算，在市場出售的碎肉餡料中，每一箱5至7噸的肉餅，怕含有為數多達1000頭動物的肉末，足以使40萬人暴露在帶病媒介。在一個漢堡飽內的肉料，可能含有來自60種不同動物的成份。而吃食這些廉價的肉餅，又大多是工人階級，這便使瘋牛症尤其具有社會因素。

尤有甚者，飼養的動物裡，只有三分一到半數是用來作食品。歐盟一名公務員說，肉類的真正市場是衍生物，這同樣會影響到人類。這類產品，包括從香煙濾咀到電視箱不等。

工人健康受到威脅

除了公眾健康和食物安全之外，還有其他值得憂慮的方面，沒有被新聞媒體提及：與動物有接觸的工人，及複合飼料的處置和環境生態問題。

隨著瘋牛症的陸續增多，歐盟政府必須解決兩大項嚴竣的問題：1,處置成千上萬可能受到瘋牛症污染的動物及已經屠宰的牛隻的殘渣問題；2,怎樣消滅用動物廢料製成的複合飼料，這些飼料的存在對健康安全構成威脅。

西班牙政府必須處置現有的1.5百萬噸動物廢料和50萬噸用動物廢料製成的複合飼料。從工人健康的角度來看，由於工作涉及到接觸生物媒介，所以必須訂立管制條例來保護工作安全。按西班牙工會聯合的組織「工人委員會」認為，規條應該對全部處理程序的風險作出評估，這包括處理、運送、開封動物和飼料的過程，對生產飼料的機器予以消毒和加以管制，以至運送動物往屠場及對屠場處理受瘋牛症感染的動物等一系列監管措施。

焚化複合飼料必造成大量一氧化碳，向氣層放出氧茂、重金屬等。西班牙政府不無道理的說，把染病的動物及受污染的飼料埋在地下，將構成嚴重的威脅，所以希望水泥公司簽訂焚化協議。不過，水泥公司一般沒有特殊的設施系統來處理這類問題，所以，政府在未有可行性研究之時便作出這種解決方法，便很難令人接受。有關的研究應該包括焚化對環境的影響，及造成工業意外的可能性，因為燃燒飼料會使工人暴露在煙霧和其他有害物質之中。而在完成這項可

行性研究之前，政府應該尋求其他可行的管理方法和技術，並且在最後處置之前，應該把有關廢料作絕對安全的儲存。

瘋牛症是發達國家帶來的病

新聞媒體和政府對下述這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噤聲不提：在國際範疇上取得資源的問題，生產者和消費者在面對跨國公司時的自主性問題；這些問題皆帶有政治性和社會性。而涉及生態性的問題則有大型農作業生產線對環境日益增加的衝擊，這種衝擊正在毀滅農業生產本身的根基，這關乎到大量使用化學肥料、伐林、濫用水源及由大量開墾而造成的土地流失。

瘋牛症是富貴病，忠實地體現了發達國家在國際經濟關係上的新自由主義模式，大型農作業生產線的模式，以及發達國的飲食模式。

食物安全也有其兩重面孔。在南方國家的問題是數量性，而在北方國家卻是質量性。

在貧窮國家裡，低生產和食物短缺造成了營養不

良、疾病和死亡。這些國家的必需口糧皆向第一世界輸出，如秘魯的鮮魚和巴西的大豆，用來餵肥第一世界的牛隻。

而在工業國家內，其國民的飲食習慣使得他們大量耗費肉食，加速競爭，生產過剩和大量繁殖，由此而產生了不公平的奶品過剩、麵粉過剩和食品過剩。大型農作業生產線模式不公平的非理性，於是由這種模式造成的能源浪費和低效率突顯出來：需要至少動用上12加路里的谷物來生產1加路里的肉。換言之，人們只需要用餵肥牛隻的15%的谷物，就足以讓人類有足夠的加路里，解決了人類食物短缺的問題！

世界的兩大飲食危機，就是這樣的互為因果：我們的膽固醇擋著我們的視線，使我們看不到別人的飢餓。這是對有關牛、人、瘋牛症、制度和模式的悲慘結論。

（史丹摘譯《國際觀點》2001年6月號）

英國處理口蹄症的背後

斯康撒古馬爾

今年3月中開始，英國農村到處升起大規模柴火，在空曠的田野裡把堆得高高的牲畜屍體焚燬，這些屍體堆有些高達130英呎。四處飛散的火煙和灰屑對鄰近居民造成嚴重滋擾，招來重重抗議。

在2001年2月19日亮相的口蹄症，繼瘋牛症之後，對英國農業帶來又一次重大的打擊。口蹄症是一種高度傳染性的過濾性病毒，對豬牛羊造成感染。患上這種病症的牲畜，在口、舌、蹄部會出現潰爛傷口。不過，這種病症不一定使牲畜死亡，而且對人類不會構成生命威脅，這和瘋牛症是大不相同的。只有處在幼年期或老、弱、傷的少數牲畜，由於抵抗力低，才會因染病而影響食慾，從而導至死亡的危險。

人類一般不會受這種疾病感染。只有極少數例症顯示，屠場工人由於通過接觸帶菌牲畜的血液，才發生類似於流行性感冒的短期症狀。

新自由主義惹的禍

全英國各地的農業區都發生口蹄症，並且廣及到蘇格蘭。在英國本土，口蹄症的病例更集中在坎布里亞郡和德文郡兩地，而這兩地同時也是旅遊業的熱點。

該怎樣看待口蹄症擴散的迅速性和廣泛性？這就誠如I·拉蒙內特在2001年4月號的《外交世界》所述：「所有流疾俱是特定歷史時空下的成因和結果，」而「英國在過去20年來，一直是極端自由主義的實驗室。」

極端自由主義推行大型農工企業的意義，就是把英國的牲畜業和奶品業置在強行大幅增加生產力、大幅削減成本開支、保證全年有產品供應，並且保證全年有對外市場。與此並行共進的，則是把牲畜業和奶品業的分銷網置於大型超級市場的控制下，由其把持

產品經銷。

由於牲畜業朝著找尋「大戶主」的方向發展，這使該業和屠宰業日趨集中，使這些行業的數量單位和地域單位的數目日趨減少。由此而來的結果，就是活生生的牲口經常被長時間圍困在一個非常窄少的範圍內，並且擠迫在巨型的運輸車裡，送往屠宰地點。由這些頻繁往還的大卡車發放出來的污染，既對道路造成擠迫，也加速地球的溫室效應。在高密集的運輸過程和屠場裡，不潔的環境和侷促的空氣，在在都是疾病迅速擴散的來源。

還有最荒謬的，就是這些橫跨全國各地的大卡車，把牲口輸往集中地點屠宰處理之後，又把處理後的肉類和奶製品運回牲畜的原產地經銷。這個荒謬的程序，同時也造成各地農村喪失整整一系列生產線的就業機會，使地方上的牲畜業經濟倒閉。大型集中牲畜業的受惠人，便集中到大型的超級市場去。

大型超級市場的連鎖網把牲畜產品的分送、處理過程集中化，不僅促成遠程運送的現象，而且令地方上的牲畜業、牲畜處理業（屠場、奶製品工場）及小商店破產。

英政府反應過劇

英國「農業、漁業和食品部」大官用高壓的方法，抑制口蹄症的感染，在農村造成了人心惶惶的危機。農業部下令各地農場劃地為牢，不許進行人畜流通，甚至勸喻城市居民不要下訪鄉間。這項指示，就是遠在感染線外的農村也不能倖免。整個鄉間被隔離封鎖起來了。

在一些地區如旅遊業重鎮的布里亞郡和德文郡，政府在時近復活節假期前宣佈這樣的措施，不啻是個重大打擊。因為，就在這兩個郡，旅遊業收入的比重是比牲畜業大得多。

不過，隨著口蹄症的病例與時俱增，英政府的反應是從驚惶進而變成恐慌，所以發生了繼後的大屠殺措施。其實，政府是另有一個可行的選擇捨而不用：注射疫苗。政府下令，把感染區及感染區三公里範圍內的牲口全數毀滅。當局原初估計，需屠殺的牲口約12.5萬口。結果，到了3月底，這個數字修訂為80萬。到後來，全部要屠殺的豬牛羊及其他家畜，數目達到2.7百萬。政府大下殺令的理由，是要防患未然。可是，至5月13日為止，即發生口蹄症流感的3個月之後，已證實的口蹄症，實在只有1593宗。而

且，據後來的化驗報告顯示，這個數字仍是高估了；實際的口蹄症，只佔1593宗的70%左右。

為什麼政府不採用疫苗注射？當中原因，是和英政府最先不採用疫苗防病相同。在1990年，歐洲聯盟採納了英國農業部的提議，廢除為牲口注射口蹄症疫苗的措施。英國農業部之所以有這個提議，是為掩耳盜鈴，唯恐一旦使用疫苗的話，就會招來其他國家疑慮，唯恐英國的牲口有病菌而乾脆禁止進口英國牲畜業產品。所以，英國農業部解除了防疫措施，是為促進出口；但這樣一來，也要冒上進口有病菌感染的產品的危險。在這次口蹄症流感的恐慌浪潮裡，英政府寧願大開殺戒，以維持產品在歐盟內的「無病菌地位」。誠如印度女性環保主義者芝娃所說：「這一場向牲口發出的戰爭，反映了那些由鼓吹食品工業制度化和全球化而製造和促進了病菌廣泛擴散的人士是多麼的瘋狂；他們製造了禍端，但同時又要求一個『全國無病的牲口』。」（見2001年4月4日英國衛報）

不是為了牲口的福祉，也不是對農村經濟有一套長遠政策，而卻是為了出口導向，致使政府採用了屠殺政策。可是，農業在國民經濟的比例是持續的下降，從1995年的60億英鎊下降到2000年的18億英鎊。至於肉食和奶製品的出口價值，在2000年更只有6.3億英鎊。

然而，更荒唐之處，還在於英國在去年向荷蘭出口了3.31萬噸雞肉的同時，又從荷蘭進口了6.14萬噸雞肉。同樣，英國向外出口了36.5萬噸豬羊肉，但旋即又進口了29.7萬噸豬羊肉！但這又何足為奇。想想看，我們的超級市場的冷藏部，不也是出售來自阿根廷的牛肉和紐西蘭的羊扒嗎！

農民工會與政府站在一線

「全國農民工會」出人意表的，支持英國農業部的屠宰政策。農民工會的大部份成員是小農，而小農其實是贊成注射疫苗。不過，工會的上層是由大農戶把持，大戶對小農的意見充耳不聞。就如一個羊農對英國《衛報》所說的：「農民工會把佔20%的大農戶的意見作為正式立場，這20%的大農戶得到政府津貼的80%份額。至於農地少於200畝的小農民，他們的意見被不聞不問……。」

歐洲聯盟和英國農業部的補貼政策，把英國的農村經濟搞腐化了。在歐盟的財政預算裡，有46%是用

作農業和農產品價值補貼的用途。這項補貼制度把二次大戰後的歐洲農業重新整頓，由它決定了畜牧業和農作業的品種。

在現行的制度下，農民只有兩種選擇：倘若牲口受細菌感染，或在事前注射疫苗，那便會失去出口產品的機會，從而承受牲口價值貶值的後果；否則，農民可以選擇追隨政府政策，屠殺牲口，那便能夠得回百分之百的津貼賠償。有鑑於此，農民都紛紛選擇屠殺來回套現金，便不難理解了。

英國國會在對待口蹄症的問題上，幾乎是沒有異議。保守黨的「反對」姿態，只在於要求派遣軍隊，加速屠殺步伐。這個意見，工黨毫無困難的便實行了。

綠黨是唯一一個持有清晰反對意見的國會黨派。綠黨反對屠殺牲口，主張注射疫苗。同時，還對農業工業化及歐盟把農業和食品工業全球化的政策提出批評。可不過，綠黨提議的反對行動，卻只限於「在每個星期二的中午，挪出一分鐘來中止全國活動，思考眼前發生的狀況。」

其他環保界的主流團體，或是對口蹄症不感興趣，或是抱持妥協態度。即使那些極力反對獵狐活動和使用動物作實驗的愛護動物團體，亦對雷厲風行的牲口大屠殺默不作聲。相形之下，「小農及家庭經營農戶協會」和由有機種植農民組成的「土壤協會」，則對政府的屠殺政策提出批評，主張疫苗措施。

農村反對政府措施

民間對政府處理口蹄症事件的反應，是有著相當程度的不安，但由於在國會內外沒有很清晰的反對意見，所以一般是採取觀望的態度。直到第一輪大屠殺開始了兩個星期，堆積成山的牲口屍體在曠野日漸腐爛和焚化，使死去的牲口比仍然健在的牲口對人類健康構成更嚴重的威脅，農村人民便開始質疑，政府執行的措施對健康會帶來什麼後果。

在露天大量焚燒牲口，放出空氣的氧化物和致癌物質會導致野生動物形成畸胎和荷爾蒙變化。隨處把大量死屍土埋，則會造成細菌污染，影響水道，也害及農地。所以，經過四月初兩個星期的屠殺後，農村的社群開始出現抗議活動，反對大量屠殺、反對用來作焚燒屍體和堆埋屍體的選址。抗議活動迅速蔓延各地，民眾用堵截道路，堵截選址，到市政府抗議的方式表達意見。

英國的農村處在衰落和受忽視的狀態，已經達到很嚴重的程度。據《1999年鄉村狀況報告》顯示，英國鄉村深受孤立和忽略，而老弱貧困者更深受其害。報告指出：「42%農村行政區沒有商店，43%沒有郵局，83%沒有醫生，49%沒有學校，75%沒有日常公共汽車服務」。150畝以下的家庭經營式的混合農場（耕作和畜牧）日益式微，而佔地超過4000畝的單作物農場比比皆是。大型農場就意味用機械取代人力，更多使用人工化肥、化學品和基因改造物種。城市日益擴展，地價高昂，使更多城市人口轉而下鄉購地，這使到農村房地產價上升，使原地居民無力購買。在農村就業的工人，多是閒散工，在工作條件和薪酬方面，比城市的最低工資更低，同時也缺乏有組織工人所享得的權利和保障。在過去20年來，農村人力下降了20%。青年缺乏就業機會，被迫流入城市謀生。

長遠的農村政策

牛津東區的國會候選人、「社會主義聯線」的約翰·里斯特提出了下列的農村政綱：

- 調回對大型農場的補助，改而補助小農戶以促進有機種植；
- 物質鼓勵小農戶組成合作社以分擔開支和減低開支，使有助於向食品公司進行集體談判；
- 物質鼓勵地方不進口和不運送本地能夠生產的物質（以削減能源使用和污染）；
- 向跨國農業集團和超級市場徵收營業稅；
- 提高國民最低工資至時薪7.5英鎊；
- 加強農業生產和食品處理工序的衛生及安全規例，加強檢察；
- 投資農村交通，俾提供廉價而有效率的公共交通工具，如公共汽車和公共鐵路；
- 投資興建農村公共設施，如青年俱樂部、小學和環境建設。

英國首相貝理雅在宣佈6月7日進行大選前的數天，宣稱政府已經成功打擊口蹄症。不過，政府也承認，在8月之前將還會陸續有口蹄症出現。從政府和農民工會的角度來看，口蹄症病疫的全盛期已經過去。不過，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口蹄症把新自由主義的農業政策，和醜聞重重的食品業披現出來，而讓我們看到的，只是農業大生意的一斑而已。

（史丹譯自《國際觀點》2001年5月號）

21世紀宣言

——150年後的《共產黨宣言》

伍德茲著 李柏青譯

乍看起來，重新出版《共產黨宣言》是需要加以說明的。爲甚麼要把這一150年前寫的書刊印新的版本呢？理由很簡單，即使時至今日，《宣言》事實上仍是一本最近代的書。我們試檢討一個半世紀前，許多資產階級對同樣主題的著作，很快便可以了解到，這一類著作祇能是符合當時歷史的利益，絲毫談不上任何實踐的應用價值。但《宣言》對我們提供了一個很深刻的分析，作者僅用了使人驚異的簡短章節，對全世界最基本的現象作出了卓越的解釋，這些現象仍然是我們目前的時代佔據全世界人類的關注的。

事實上，今日讀《共產黨宣言》較之1848年發表時更爲真實。在此，讓我們觀察一個例子：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寫作時，全世界的跨國公司形成仍然是遙遠將來的音響。儘管如此，他們已經指出“自由企業”及競爭將無可避免地導致資本的集中及生產力的獨佔化。坦率地說，閱讀資本主義保衛者的聲明，指責馬克思對這問題是錯誤的見解是十分可笑的。事實正相反，這是馬克思最卓越及無可否認的預測。

在80年代號召小型是美麗的變成流行的風尚。在此我們不打算去討論大小或中型規模的好壞，個人有權保留自己的意見。但馬克思預測的資本集中過程已經發生，發展，是一個絕對無可否認的事實；而且，在過去十年來達到史無前例的高度。

以美國爲例，資本集中發展過程的形成特別明顯。在1994年，500個龐大獨佔企業，佔全部所有收入92%。在全世界範圍內，1,000個最巨大的公司的收入超過80億美元，等於全世界總共利潤三分之一。在美國0.5%最富裕的家族，佔有半數以上的個人總共財產。約最富裕的1%的美國人口的收入，佔全國總收入從1978年17.6%驚人地增加至1989年36.3%。

資本集中及趨向中心化的過程已達到從沒有想像到的程度。所有先進工業國家，收購或合併變成盛行的交易。1995年公司的收購數目達到最高紀錄，三

菱銀行及東京銀行合併組成世界最大的銀行。大通銀行及化學工業銀行（Chemical Bank）的合併，成爲美國最大的銀行集團，擁有2,970億美元的儲備金。世界最大的娛樂公司出現是由於和路迪士尼收購首都/美國廣播公司（Capital Cities/A.B.C.），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收購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時代沃爾納（Time Warner）收購特納廣播網系統（Turner Broadcasting Systems）。在製藥部門，格拉蘇（Glaxo）收購威爾科美（Wellcome），金伯利·克拉克（Kimberly Clark）收購斯科特紙廠（Scott Paper），成爲世界生產手巾紙，及衛生紙最大宗的紙廠。收購狂熱已傳播到歐洲。過去數星期來做成新的紀錄。即使在瑞士，已首次經歷到霍爾維斯（Holvis）紙產集團敵對的收購行動。在英國，我們看到一連串的敵對收購事件發生。如福爾德（Forte），英國最大的連鎖旅館，以32億鎊收購了其競爭者格拉娜達公司（Granada）全部的娛樂及餐店業。多數的合併式收購是秘密進行與使用不正當手段相關連：內部交易、製造股值、及其他類型的騙局、盜竊及欺詐等，正如吉尼斯（Guinness）紀錄所暴露的醜行。

要提供更多的數字，去解除懷疑馬克思及恩格斯對資本集中過程的分析是毫不困難，資本的集中並不表現生產的增加，而恰好相反，每一收購的目的，不是要投資新的廠房及機器，而是將已經存在的廠房關閉，及大量解僱工人，以便能夠擴張利潤的限度而不需要增加生產。

失業的禍害

"由此可以明顯地看出，資產階級已再不適合爲社會的統治階級，不可能把自己階級生存條件，當做支配一切的規律強加於社會了。資產階級不適宜再統治下去了。因爲它甚至不能保證自己的奴隸維持奴隸

的生活。因為它不得不讓自己的奴隸落到不能養活它，反而要它來養活的地步。社會再不能在資產階級的統治下生存下去了。”（《共產黨宣言》）與勞工領袖過去的想像相反，大量的失業現象已重新散佈全球。如同惡瘤侵蝕現代社會的內臟。根據聯合國的統計，全世界失業人口達到一億二千萬。但這數字與其他官方統計一樣，都是極大低估實際數目的。如果我們將大量的男女工人，被逼於無奈而只能在邊際線“職業”工作計算在內，實際全世界失業及就業不足的人口，不會少過十億。

據官方統計，單是西歐失業人口就超過一千八百萬（等於工作人口10.6%）。西班牙的失業數目最嚴重，竟達到20%。即使德國，“歐洲的強人”失業人口自希特拉時代以來首次達到四百五十萬。日本的情形也是如此。自1930年代以來，失業人口開始增加。想像中的日本是全部就業的天堂，現在已成為過去的歷史。依據官方的數字，日本失業人口達到百分之三，但這是不真實的。假如他們用與其他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用的失業標準計算，真正失業人口不會少過百分之八，或甚至超過百分之十。

這種失業的情況並不是週期性的。如同工人過去所熟知的，當經濟衰退的時候，失業就會增加。而經濟好轉時就業也就恢復了。但現在已不再是這種情況了。正當這篇文章寫作的時候，美國經濟繁榮持續超過六年。但世界的失業人口並沒有顯著的減少。每日報章報導新的工廠關閉及解散（目前胡說是“縮減”），經常是與上述的收購相關連的。這不是週期性的失業，或者是馬克思所指出的“工人後備軍”，從資本家的觀點看來，過去起過作用的。相反，這是一個完全新的現象——永久性的、結構性的、有機性的失業。即使在“繁榮”時期也並無顯著的減少。而且，失業所影響到社會的某些部門，過去是不會發生的。像教師，醫生，護士，公務員，銀行僱員，科學家，甚至於經理，都沒有安全感，實際上成為整個社會普遍化。上面所引馬克思及恩格斯的預言已變成千真萬確的事實。各國資產階級都提出同一戰鬥口號：“我們必須削減公共開支”！不久前，這是撒切爾（Thatcher），梅杰（Major）的口號，現在成為托尼布萊爾（Tony Blair）及右翼勞工領袖所走的同一道路。這並非偶然的，資本主義世界每一個政府，

不管是右或“左”，事實上都是追求同樣的政策。這並不是由於政治家個人突然產生的念頭、無知或不誠實（雖然這種情形很多）的結果。而是資本主義制度自身無出路的生動的表現。

資本主義經濟上升的年代從1948至1973，資產階級能夠（部份的及短期性的）解除對進步作最大制動的兩個基本矛盾：生產資料私有制及民族國家。資本主義存在帶來生產工具的龐大力量，早已突破這狹窄的範圍，這就是目前危機的真正根源。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資產階級曾企圖尋求解救，一方面應用凱恩斯辦法的赤字財政，另方面加深國際勞動分工及前所未有的擴大國際貿易。可是目前這兩種程序已達到其限度，應用凱恩斯方法（使人難以置信的左翼改良主義者仍然主張）將導致爆發通貨膨脹，及如馬克思主義者預測的各種無法支撐的赤字的後果。馬克思曾經在“資本論”中已經闡述過，資本主義如何用信用的辦法可能擴張到其所受限制的範圍。但是這辦法是有限度的，這點米考伯先生（Mr. Micawber）*知道得太清楚了！結果他們現在被逼將整個進程倒轉過來，在絕望中企圖用削減公共開支來恢復“健全財政”。換句話說，要恢復過去1920年代及1930年代的情勢，或者甚至於回到馬克思時代的情勢。這就是對各地階級鬥爭爆發最後使用的手段。不僅如此，削減國家開支，他們同時減少需求及減少市場，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承認，全世界生產過剩（生產能力過剩）是個嚴重的問題。發展下去將引起大衰退時期的到來。這是無可避免的後果，是由於早期資本主義制度擴展超過其限度的事實。如馬克思分析的：“這不過是資產階級準備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機的辦法，不過是使防止危機的手段愈來愈少的辦法。

*米考伯（英國作家狄更斯小說《大衛·科波菲爾》中的人物）無遠慮，想著走遠的樂天派。

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

過去數年來經濟學家都大談“全球化”，認為這是可以消除繁榮及衰退循環的萬應靈丹。可是這些幻想被1997年10月股票市場的崩潰，以及所謂亞洲虎的危機粉碎了。當我寫這幾行字時，消息剛傳來：日本重要的財經公司山一證券交易（Yamaichi Securities Co.）已倒閉。這將使世界各地都受到

嚴重的影響。日本財政的崩潰，可推使美國走向衰退。亞洲危機影響日本特別嚴重，因日本出口百分之44是銷售亞洲各國的。股市崩潰結果將日本銀行系統的弱點立即暴露出來。而日本又是世界上最大的貸款者。估計日本最大的五間銀行，從嚴格的法律意義來說已經是破產。據日本的首位財經日報，日本經濟新聞（Nihon Keizai Shimbun）透露，目前日本銀行的壞賬動蕩達到1.5萬億日圓。財政崩潰的危機連日本銀行高級職員都承認。曾在97年11月22日對英國《經濟學人》說："這是一個很明顯的系統危機存在的實例"。假使這危機導致大量從美國收回日本基金，結果將造成很大的災禍。

所有這些指出"全球化"反的方面，資本主義在程度上發展了世界經濟，但也準備了在某一時期毀滅性的世界倒退。世界經濟中一部份的危機率（如亞洲例子）便迅速地擴展到其他各部份。要消除上升及倒退現象的循環還很遙遠。全球化使這循環變成更猛烈及普遍性。

任何讀過《宣言》的人，都可以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50年前已準確的預料到這局勢，他們解釋資本主義必定發展成為整個世界的系統。今天這分析已被事變明顯的証實了。現在沒有甚麼能否認，壓倒的世界市場的統治，是我們生存時代最決定性的現象。這個時代是世界經濟、世界政治、世界文化、世界外交以及我們不要忘記的世界大戰的年代。整個廿世紀我們已經歷過兩次，由於資本主義危機結果造成的大戰。第二次造成五千五百萬人死亡，及幾乎導致人類文明的毀滅。

社會主義是國際性的，否則便不是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並非是感情主義的產物。它不僅是個"好的觀念"，而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科學的分析所得的。他們認為資產階級勝利，其中一個有進步意義的就是民族國家的誕生。將無可避免的導向世界貿易。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生產力的強大發展，是不能夠局限於民族國家狹隘的範圍之內，因此，所有資本主義列強，即使是最強大的，都被迫於加入更深廣的世界市場。

巨大生產的潛能與民族國家束縛的窒息之間的矛盾，已在1914及1939年顯著的暴露了。從歷史觀點的事實來說，這些血腥的動亂，顯示出資本主義制度

的進步作用已消耗盡了。然而，從資本主義將自動崩潰的觀念，去推斷這些事件是資本主義最後危機，是沒有這麼一回事的。為了實現改變社會，僅是舊制度的危機是不足夠的。不管危機如何嚴重，現存的強大的統治者的利益，基於保持其利潤收入、特權及威望的現狀，和激烈的抗拒所有改變社會的企圖。正是因為這些理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這《宣言》，不是抽象的文件，而是一個行動的號召；不是一本教科書，也不是一個討論會的文件，而是一個為建立革命政黨的綱領。

為要推翻資本主義，工人階級必須組織起來，保衛其自身階級的利益。數十年來所有國家的工人，尤其是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已建立起強大的組織：政黨及工會。但這些組織的存在，不是與實際環境隔絕的。它受到資本主義的壓力影響，特別是組織的高層受的壓力最大。

國家主義普遍的破產，特別是極端荒謬變型的所謂"一國建設社會主義"，即使在中國及俄國的官僚層加入世界市場之前，跟隨斯大林主義的崩潰，已經早暴露出來了。所有非洲，亞洲及拉丁美洲的國家，爭取到從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獨立鬥爭，現在發現在世界貿易的機構鎖鍊下，被他們的舊主人又重新束縛。

每一個有理性的人都認識到，生產力的自由發展，需要全世界各國統一經濟，通過共同的計劃允許對全球資源為全人類的福利作和諧的開發。這點很顯明的已為科學家及專家們所認識，他們並不是基於社會主義的觀點，而是對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口，生活條件的惡劣，義憤不平，及憂慮環境破壞的後果。不幸的，他們好意的勸告沒有受到重視。因為這是和大跨國公司統治世界的既得利益相衝突的。而且這些公司的精心策劃，並非基於人類的福利或者整個宇宙的未來，而是完全出於貪婪與尋求利潤、不顧一切的考慮。

在20世紀最後十年，儘管關於全球化的商討，國家間的矛盾變得比以前更為深廣。十年前美國出口等於國內生產總值6%，現在這數字升至13%。而華盛頓計劃到2000年增加至20%，這等於是對全世界宣戰。從對日本開始，並非軍事戰爭而是貿易的戰爭已在進行。

真的，在過去任何一個時期，美國與日本之間的

緊張局勢，已經爆發了戰爭，祇是由於核子武器的存在，使得主要資本主義列強間的戰爭，目前才可能暫時避免。因此，目前的危機不可能像過去1914及1939一樣去解決的。軍事衝突不存在，每一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危機變得更為深廣，統治階級無可選擇，只有將危機的責任轉架在工人階級的肩上。

令人難以置信的遠見，《宣言》作者預測將來的情況，正是現在各國工人階級所體驗到的。下面就是他們當時的陳述：

"由於推廣機器和分工，無產者的勞動已經失去了任何獨立的性質，因而對工人也失去了任何吸引力。工人變成了機器的單純的附屬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極其簡單、極其單調和極容易學會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費用，幾乎只限於維持工人生活和延續工人後代所必需的生活資料。但是，商品的價格，從而勞動的價格，是同它的生產費用相等的。因此，勞動愈使人厭惡，工資也就愈減少。不僅如此，機器愈推廣，分工愈細緻，勞動量也就愈增加。這是由於工作時間的延長，或者由於在一定時間內所要求的勞動的增加，機器運轉的加速，等等。"

今天美國所佔的地位，與英國在馬克思時代所佔的相同，都是資本主義最發展的國家。因此資本主義一般的傾向表現得最清楚。過去廿年來美國工人真正工資減低20%，而同時延長了10%的工作日。這樣，現時的繁榮大部份是以犧牲工人階級為代價的。目前每個美國工人，每年平均加班168小時，幾乎等於一個月的額外工作。這情形在汽車工業特別明顯。每日工作九小時，每星期工作六天是定額。據美國工會的報告，假使每週工作只限於40小時，僅在這部份便可產生59,000工作。

根據時代週刊 (Time Magazine 24.10.94) 一篇文章的報導："工人訴苦，經濟擴張以他們來說便是耗盡精力。整個美國工業，公司實行加班工作的辦法，以榨取在美國的工人的最大勞動：目前每週工作時間平均接近42小時。包括4.6小時的加班"。同一篇文引舉一纖維光學工人約瑟·凱爾特波恩 (Joseph Kelterborn) 為例，由於公司裁員，他平均每天加班4小時，每三週要做一個週末的加班。他訴說："當我回到家裡時，我所有時間就是洗個澡，吃飯和小睡；一會兒起床又重新去開始工作。"

加班造成可怕的壓力，實際工資減少，生產節奏的增加，等等，令工人階級及家庭生活的質素受到嚴重影響。美國和其他國家一樣，從在1960年代初，生育率平均每家庭為2.5個兒童，至1980年代後期降為1.8個兒童。1970年代離婚數增加一倍，等於1980年代結婚數60%。即使是壽命的延長到1980年已停滯。

英國亦發生同樣的情形。在撒切爾政府執政時期，工業中約二百五十萬工作被消除，而生產仍能夠保持如1979年的水平。這並非是由於引進新的機器設備，而是從加重剝削英國工人去達到的。在1995年衛生部長肯尼思·卡爾曼 (Kenneth Calman) 曾警告說，"由於喪失終身職業，惹起了普遍與生活壓力有關的疾病。"

在1994年，因為疾病，使得英國損失一億七千五百萬工作日。幾乎每個工人的八工作日。醫藥處方一年內 (1995) 增加一千一百七十萬。運輸及普通工人工會的報刊"記錄"宣佈：生活壓力，交通阻塞及環境污染，是令到英國的職業司機筋疲力盡的。"據工會作的研究，30%的司機承認在駕駛時曾入睡。結果造成近於45%的交通意外。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亦有同樣的例子。"

馬克思的方法

《宣言》作的預測，使人震撼的準確並非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而是從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辯證法唯物論）應用在歷史上的分析。這就是所謂歷史唯物論。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的基礎，在早期的著作，如《神聖家族及德意志意識形態》 (Holy Family and The German Ideology) 已經建立了。

我們必須記住社會主義及共產主義，並不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開始，以前許多偉大的思想家，已經有保衛一個建基於公有財產，沒有階級的社會的思想；歐文，傅立葉，聖西門及其他等人。早在十六世紀時，莫爾曾寫過一本很有名的書，"烏托邦" (Utopia) 描述共產主義社會。甚至在這些人之前，早期的基督徒，在自己組織的社區內，是強烈地排斥私有財產的。任何人只要去讀《使徒行傳》 (The Acts of Apostles) 就可以認識到。

馬克思和恩格斯描繪這些傾向為空想社會主義。

而他們所倡議的，是有所不同的社會主義。究竟兩者在基本上有甚麼區別呢？在空想者看來，社會主義是一個很好的理想，只要竭力使人信服，在道德上是可行的。依據這觀點，如果他們是正確的話，這樣一個新的社會，早在二千年前就可以實現，而且肯定人類的災難會大大地減少了。但是馬克思和恩格斯解釋，社會主義是有其物質的基礎，包含有生產力（工業，農業，科學及技術）發展的水平。歷史唯物論解釋的歷史發展，最後分析說來，就是基於這些事物的發展。整個人類歷史進程，很清楚証實這確信，是被那些詆毀馬克思主義者，特別用作最尖銳的攻擊。但他們所攻擊的，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觀念，而祇是一種低鄙的諷刺，指馬克思主義“將一切事物歸於經濟”這一荒謬的概念。《宣言》的作者曾多次回答這荒謬言論，我們可以很容易從恩格斯致布洛赫（Bloch）的信中看到的：

「根據唯物史觀，歷史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到底是現實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無論馬克思或我都從來沒有肯定過比這更多的東西。如果有人在這裡加以歪曲，說經濟因素是唯一決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這個命題變成毫無內容的、抽象的、荒誕無稽的空話。經濟狀況是基礎，但是對歷史鬥爭的進程發生影響並且在許多情況下主要是決定著這一鬥爭的形式的，還有上層建築的各種因素；階級鬥爭的各種政治形式和這個鬥爭的成果——由勝利了的階級在獲勝以後建立的憲法等等，各種法權形式以及所有這些實際鬥爭在參加者頭腦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學的理論，宗教的觀點以及它們向教義體系的進一步發展。」

宗教、政治、道德、哲學在歷史過程中起過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而最後來說，一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成功，有賴於它能滿足人類基本需要的能力。在發展宗教、政治或哲學理想之前，男人及女人都需要食物、衣服和居室。從最早的時候開始，人類就是為這些需要鬥爭，直到目前，絕大多數人仍然是如此。

每一歷史時代，分工的產生，是歷史上與社會劃分階級開始同時發生的。這代表一個大躍進，它允許首次創造剩餘生產物，佔有這產物的階級是從必需勞動解放了。統治階級，是依賴別的階級的勞動維持生活：在古代，別的階級就是奴隸，隨後在封建制度下

是農奴；最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是工人階級。不管與階級社會相連的帶來所有的恐怖、不公平及痛苦，從馬克思主義觀點，這就是說從科學的而非道德的觀點來看，階級社會在歷史上是適當的，並且與推動社會前進起過進步的作用。我們不要忘記，希臘及羅馬在科學，藝術及哲學方面光輝的成就，就是基於奴隸的勞動，這羅馬人稱它是“有聲音的工具”，從老闆的觀點來說，現代工人目前的情況並沒有很大的區別。被剝削階級勞動的生產剩餘，足以解放很少數的剝削者。但不能夠完成大多數人的解放。奴隸是文化興起的先決條件，可能做成生產資料的發展。馬克思和恩格斯發現社會發展一個重要的規律。僅是這單一的規律，便能夠解釋人類歷史的發展。他們解釋每一社會結構，只能繼續存在到它發展生產力的限度，除非包含在它內部發展的潛力已經耗盡，否則這社會是不會死亡的。

就是在這個意義，我們可以將一個社會經濟制度和一個生存的有機體作比較，它不是甚麼永遠都在停滯和固定的。如同那些資本主義的保衛者一樣，要我們相信他們坦率荒誕的斷言。說市場經濟是有自然發展的基礎，和任何其他社會制度一樣，資本主義出現，發展達到完全成熟，但繼後便達到發展的極限，而現在已進入毀滅性的衰退了。

一旦我們根據這個科學的立場，便能夠了解到歷史並不是一連串沒有意義及不連貫事件的累積，完全由偶然發生決定，或完全由於“偉大的個人”的活動的結果（當然主觀的因素對歷史在某種情形下起決定的作用）。然而如演變過程受規律的支配，和其他自然界一樣是可以了解的。

正如達爾文的解釋，人類並非是永恆的。他們有過去，現在和未來，是不斷繼續改變及進化；同樣，馬克思恩格斯解釋，一個確定的社會制度不是永遠定型的。這就是每一時代錯誤的觀念，每一社會制度，認為它是代表當時唯一的可能人類生存方式。它的制度、宗教、道德是最後的証明。這是那些食人生番部落，埃及祭司瑪麗安東尼和沙皇尼古拉斯都強烈相信的。而且這就是資產階級及其辯護者（雖然沒有絲毫根據）。目前向我們保證，希望能証明所謂“自由企業”是唯一可行的制度，而這制度正在開始崩潰了。

改良與革命

現在"進化"觀念已被一般，至少在受過教育的人所接受。達爾文觀念，在當時是革命的，幾乎被接受為自明之理。但是一般所理解的進化是一緩慢及逐漸的、沒有阻斷及強烈變動的過程。在政治上，這種爭論經常被改良主義者用作辯護。可惜，它是基於錯誤的了解。其實進化過程即使在今日仍然是沒有解答的一本書。這是不驚奇的。因為達爾文自己並不了解。祇是最近十多年由於古爾德（Stephen J. Gould）在古生物學的發現。他發現了斷續性平衡理論（Theory of punctuated equilibrium），証明了進化不是一個逐漸過程。在長期間內可能沒有察覺到大的變動，可是到了某一確定時間，進化過程便被激烈的變動所中斷。一個名符其實的生物的革命，使到某些種類大量的消滅，其他種類迅速出現。當然，將社會和自然類比祇不過是相若的，但即使從最表面的歷史觀察，也証明逐漸論者是毫無根據的，我們知道，社會和自然一樣，在長期間是緩慢及逐漸變遷，但同樣達到某一時間便變為激烈的發展（戰爭與革命）阻斷，變化過程是巨大的加速了。事實上，這些事變成爲歷史發展的主要動力。而且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事實上一個特定社會經濟制度已達到它的限度，已不能和以前一樣發展它的生產力。

"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是《宣言》中之一最著名的語句。但甚麼是階級鬥爭呢？簡直就是爲工人階級剩餘生產物分配的鬥爭。這鬥爭經常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生產力達到一個發展充足的水平，使財產及生產品不足消滅，不僅祇是爲少數特權階級，而是爲全體每一個人。因此，社會主義不祇是一個"好的理想"，不管在任何情況下，祇要人們需要就可以實現的。社會主義有它的物質基礎，是基於工業，農業，科學及技術的發展水平上的。

早在1845至1846年，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的著作"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曾解釋過，"……這生產力的發展（它本身是含有人類生存的具體經驗，是指在世界歷史性而非地方性範圍的存在）是一個絕對需要實現的先決條件，因爲如果沒有這種發展，那就祇有貧窮的普遍化，而在極端貧困的情況下，就必須重新開始爭取必需品的鬥爭，而且全部陳腐的東西又要死

灰復燃……"

"全部陳腐的東西"這句話，馬克思及恩格斯心目中，是指不平等，剝削，壓迫，貪污，官僚，國家及所有一切罪惡，是階級社會一般普遍的現象。今天，由於斯大林主義在俄國的崩潰，社會主義的敵人企圖用來証明，馬克思主義的觀念是不能夠實踐的。可是他們忽略了其中一些細節，就是1917年前的俄國比現在的印度還落後。列寧及布爾什維克是很了解馬克思的理論，很清楚知道俄國是缺乏實行社會主義的物質條件，而且列寧及托洛茨基從來沒有一個國家革命，或"一國建設社會主義"這種觀念，至少在所有和俄國一樣的落後國家是如此。1917年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是從世界革命的展望出發的。十月革命對整個歐洲是強大的推動力，從德國開始，如果不是社會民主黨領袖可鄙的叛賣，去挽救資本主義，革命是可能成功的。這個罪惡，世界付出可怕的代價。兩次大戰二十年間經濟及社會的大騷動，希特拉在德國的勝利，西班牙內戰，最後是新的世界大戰的恐怖。

在此，我們無須去分析1945年後整個演變的過程，亦足以可說資本主義在某一時期是成功的。至少在西歐、日本及美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是如此。使用以前所提到的方法，去重新建立相對的穩定，但即使在這時期，基本的矛盾並沒有解除，三分之二人類是在連年陷入飢荒、貧困、戰爭、革命反革命悲慘的境遇。然而，至少在工業化進步的國家，是全部就業，福利國家及生活水平普遍的增高。所有這些使得勞工領袖（左傾及右傾同樣）確信資本主義已可以解決它的問題，大量失業已是過去的事，階級鬥爭已經終結；因而（當然），馬克思主義已經是過時廢棄了。這些觀念與今天事實對比真是極大的諷刺啊！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超過三千萬人失業。各國野蠻地打擊工人的生活水準，階級間矛盾變成前所未有的激烈。在歐洲，罷工行動接連在法國、德國、西班牙、意大利、比利時發生。在美國，宏大的聯合郵遞包裹服務（LLPS）工人罷工勝利的結果發出的警告，美國工人是再不能繼續接受由於爲了高利潤的利益的低工資及惡劣工作條件了。同樣在英國，經過保守黨18年的統治選出了工黨執政，便是顯示社會傾向於基本改變的要求。

"社會存在決定意識"，這就是形成歷史唯物論

另一深刻觀念。社會環境遲早會造成人類意識的改變。然而在社會變遷的過程與人類意識的反響之間的關係不是自動的。否則我們早已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活了。和理想者相反，人類的思考普遍不祇是不進步，而且是極端保守的。在"正常"時期，多數人是趨於保持所熟識的事物。他們寧可相信那些已成為慣常的觀念、道德、制度、政黨及領袖。

恩格斯曾說過，某段時期的歷史，二十年的經過如同一日，但在另一時期二十年的歷史可以總括在24小時之內。在很長的時間內似乎甚麼都沒有改變，無論如何，在似乎平靜的表面的下面，已造成龐大的不滿，義憤，失望與憤怒的增加，等到某一時刻，將引起社會的爆炸。危機發生的時候，人們便開始想到自己，像自由的男女人一樣採取積極的行動，不願作消極的犧牲。他們尋求一個有組織的表示方法，積極參加工會及群眾團體的活動，企圖去改變社會。《宣言》中之一重要部份，如不是十分了解的，我們可以讀下列的章節：

"共產黨人同全體無產階級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共產黨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黨相對立的特殊政黨。他們沒有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不提出任何教派的原則，用以塑造無產階級的運動。

"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是：一方面，在各國無產階級的鬥爭中，共產黨人強調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共同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鬥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

"因此，在實踐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先進的部份；他們勝過其餘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於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過程和一般結果。"

這幾行章節是極其重要的。因為它提出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方法，是從具體真正工人階級運動出發，而並非是從我們所希望發展的運動。這方法與那些無效果的宗派主義的方法有很大的距離。這些"革命"宗派是圍繞勞工運動的外圍存在，不可能與真正的工人運動建立基本的連系。

作為馬克思主義者，黨首先最重要的是綱領、觀念、方法及傳統。跟著是有組織地將這些觀念在工人階級中實行。在歷史上，工人階級曾建立過許多龐大

的組織來保衛自己階級的利益及改造社會。從組織工會開始，經過一段時期工人就會了解這階級的基本組織祇是為部份的經濟要求鬥爭是不足夠的。以今天的條件看來，這個結論是絕對無可避免的。事實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沒有經過日常的鬥爭推動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的。經過罷工及示威的經驗，工人階級領悟到獲取自己權力的觀念。但是光有觀念仍是不足的。即使是最堅強及成功的罷工還不能夠解決面對工人階級的基本問題。而且，每一次成功的罷工是經過很多次的失敗，即使鬥爭的結果是得到勝利，工資增加最終是被通貨膨脹抵銷了。資本家由左手付出的他們可以從右手收回。在資本主義危機的時期反改良代替了改良，這就是我們目前見到的布萊爾（Blair）政府的政策。這是有其自身的邏輯的，如果接受資本主義的制度則必須接受資本主義的規律。如你提出"A"你必須提到"B"、"C"及"D"。失業，私有化，削減社會福利開支都是從資本主義一般的危機而來，這是一個政治問題。不能單從工業的行動來解決，雖然這行動很重要。工人階級必須超越過工會活動的範圍，進入政治鬥爭的平面。

工會及群眾工人黨是從工人階級經過幾代的鬥爭及犧牲建立起來的，所有歷史證明，工人階級在沒有經過重覆實踐證明之前是不會放棄他們的傳統群眾組織。近在一百年前工會建立了勞工黨，目的是為了要在國會裡代表工人階級。勞工黨的成立有如工會在政治上的表示。但群眾組織不是在真空內存在的，他們經常接受統治階級手中強大的說服工具的壓力：報章，電視，教會，及一千零一種高壓手段，影響及賄賂勞工代表。最近透露一商人捐贈一百萬英鎊給工黨的醜聞，祇是表面上的一小部份。商人捐贈這樣數目的錢，並非是沒有代價的。即使我們不完全相信實際上的賄賂行為，大企業對工黨領袖的壓力確定是很龐大的。右翼領袖毫無問題地自願受到這些影響，因為他們是誠心樂意接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諷刺意味的事是他們歌頌"市場"時恰好正是市場開始崩潰了。

勞工右翼領袖們是盲目將自己置於已經不再存在的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他們代表的是過去不是將來。雖然他們自認為是偉大的理想主義者，事實上他們是空想家中最壞的一類。他們固定著勞工的基礎，將被到來的事變的影響粉碎的。然而，左翼改良主義

者的立場並不好得多少。雖然他們是正確地反對右派實行的反改良政策，但在實行上他們沒有提供真正的選擇。由於接受資本主義制度，他們同時希望施行較仁慈及溫和的政策。這似乎是要要求老虎吃草不要吃肉！如果全世界各國的政府都實行同一削減的政策，不僅是沒有任何選擇，而且顯示了資本主義危機加深的事實。企圖採取過去凱恩斯通貨財政政策，可能會引起通貨膨脹的爆發。以工人階級來說，在通貨膨脹與通貨緊縮之間的選擇就是死刑，用吊死與用火慢慢烤死之間的選擇，兩者都是同樣為害的。唯一解決的方法祇有社會主義改變整個社會。

唯一道路

當馬克思和恩格斯寫這《宣言》時，他們是兩位青年人，分別是29和27歲，他們寫作時正值是反動黑暗的年代，工人階級很顯然是靜止的。《宣言》是在布魯塞爾寫成。是當時作者被迫逃亡作政治難民的居留地。然而正當《共產黨宣言》首次在1848年二月發表時，革命已經在巴黎的街頭發生了。隨後的幾個月內便像野火般蔓延及整個歐洲。

假如跟隨歷史有任何可以使我們認識到的，這就是：沒有任何一種力量可以打破工人階級改變社會的不自覺的意志。是的，曾經有過很多次悲慘的失敗，如1848年革命、巴黎公社的失敗，和現在最後俄國十月革命遺留的所得也消失了。然而在每一次失敗後，工人階級經常是能夠從每次倒退的影響中恢復過來，並回到鬥爭的道路去。這是很顯然的，因為他們是被迫於沒有選擇，回顧過去，雖然受到最嚴重的失敗，但這祇是工人階級為了完成他們最後解放的長期鬥爭中的一段歷史吧了。

然而歷史也使我們了解到，為要成功，僅是有鬥爭的意志是不足夠的，必須要自覺地去戰鬥。要有科學的綱領的武裝和展望。沒有它，勝利經常是不可能的。但它並非是自然產生出來，當群眾已經開始動員向當局挑戰時，不可能立即建立政綱、策略及戰略。這些必須在事前預先準備，必須爭取到一兩次的勝利去教育及培育馬克思主義者幹部；與工廠、礦場、辦公室、學校及大學等結合在一起，在每一工會及工黨支部，在每個工人代表委員會及工會代表會積極活動。必須忍耐進行準備宣傳及鼓動工作，將工人及青

年日常的鬥爭與整個社會主義轉變社會的前途連系起來。祇有這樣，我們不僅在英國，而且在歐洲以及全世界能夠對行將到來的事變，作出準備。

儘管詆毀者不遺餘力的攻擊，馬克思主義今日仍然保留其全部正確，不僅是正確分析目前社會，而且以之作爲改變社會的戰鬥綱領。其中一些細節可能有改變，但在整個基本原則，《共產黨宣言》的觀念在今日如同第一次發表時，都是同樣的關連和真確。真的，在某方面來說今天《宣言》是更真確了。1848年革命蔓延歐洲，但歐洲以外祇有微弱的反響。1917年十月革命湧起的革命高潮，不僅影響歐洲，而且達到中國、印度、波斯及土耳其。但現在由於世界資本主義已將整個地球緊密的結合在一起，是準備著更巨大激變的發展。面對這樣互相關聯的程度，我們自信可以預測：今後工人階級在任何一個主要國家的勝利便會很快地各國跟著，將資本主義制度推翻，為建立社會主義英國、歐洲社會主義合眾國，及整個世界社會主義聯邦奠定基礎的。

倫敦1997.11.26

附註：

歐文（Owen, Robert, 1771-1858）英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合作運動的先驅。早年在蘇格蘭經營紗廠，後提出社會改革方案。曾去美國試辦共產主義新村——“新和諧”社區。結果失敗。著有《新社會觀》等。

傅立葉（Fourier, Francois Marie Charles, 1772-1837）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罪惡，設想建立以農業結合的“法郎吉”（Phalasteree）

聖西門（Saint Simon, Comte de, 1760-1825）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認為科學，道德，和宗教的進步推動歷史發展，主張新社會保留私有制，由知識份子和實業家領導。著有《論實業制度》等。

莫爾（More, Sir Thomas, 1477-1535）英國人民主義者，天主教聖徒，曾任下議院議長、內閣大臣（1529-1532），《烏托邦》一書的作者。因對國王亨利八世離婚案和教會政策持異議，被誣陷處死。1935被追諡為聖徒。

古爾德（Gould, Stephen Jay, 1941-）美國古生物學家。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

(三)

曼德爾著 兆立譯

第三章

托洛茨基的

反斯大林主義官僚層的鬥爭

一

1923年10月，俄國共產黨內部的左派反對派，以提出《四十六人的政綱》初露頭角。^{<1>}接著，托洛茨基於1923年12月在《真理報》上發表文章；1924年，以《新路線》的書名^{<2>}，作為單獨的小冊子而出版。這兩個文件都攻擊黨內民主之被壓制，譴責黨機構漸增地將權力制度化。這個黨機構，在一個五十多萬黨員的政黨中，在短短時間之內，已從少於800位全職幹部，暴增到擁有18,000位全職幹部。這個龐大的黨機構，由斯大林通過中央委員會書記處集中控制，有系統地窒息任何批評、表達意見或黨內自由討論。政治局每週開一次會；斯大林管理下的書記處則天天開會，而且作出大多數決定，特別是有關人事的。

《四十六人的政綱》讀起來好像期望著蘇共在1988年的第十九次大會上所作的激進的估計，這個估計說，從1924年開始，蘇聯的各級蘇維埃已經失去了一切權力，黨內不再存在民主了。其實，早在1923年，左派反對派已認識到這點，而且毫不含糊地寫在此《政綱》中：

在黨內關係上，我們也見到同一的使黨癱瘓、把黨打碎的、不正確的領導層；這在我們目前所經受的這個危機時期，似乎特別明顯……。

我們以以下的事實來解釋它：在外表的、形式上的底下，我們在實際上不但片面地招收某些個人，而且在處理事務上傾向於片面地適應一個狹窄圈子的觀點和同情。由於黨有了一個受這樣

狹窄考慮所歪曲的領導層，黨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再是那個活生生、獨立、敏感地掌握現實的團體，因為它是千絲萬縷地與這個現實纏在一起的。不但不是這樣，我們現在還觀察到越來越增多的、現在幾乎不隱瞞的把黨分為兩邊的現象：一邊是書記處的等級制度，另一邊是“安靜的平民”；一邊是從前者招收來的職業黨官，另一邊是不參加公共生活的一般黨員群眾。

這是每個黨員都知道的事實。不滿意中委會或省委會的這個或那個決定的、對他們的心意有過這個或那個疑問的、私人地注意到這個或那個錯誤、不規矩或混亂的黨員們，不但不敢在黨會議上說出這個事情，連在談話中也不敢說它，除非對方是“謹慎”的、可靠的人；黨內的自由討論事實上已經消失了；黨的輿論被窒息了。現今，提拔、選舉俄國共產黨的省委會和中委會委員的，不是黨，不是它的廣大群眾。相反地，黨的書記處的高層在越來越多的情況中，招收會議和大會的會員，這些會議和大會越來越變成爲這個高層的執行會議了。

在黨內所建立的這種權力機構完全是不可容忍的；它破壞了黨的獨立，以招收來的官僚機構代替黨。這個官僚機構在平常時候還可以做點事情，但是在危險時刻就一籌莫展了。這個官僚機構在嚴重事情逼近的時候就變得毫無效力了。

——《四十六人的政綱》第7頁

政治局的大多數——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頭政治，加上布哈林的支持——侷促不安地作出正式的反應。他們確認了實行一條“新路線”和更多黨內民主的需要。^{<3>}但是在這同時，他們發動了一場反對托洛茨基和反對派其他代表的運動，^{<4>}首先指控他們進行“宗派活動”，後來指控他們犯了“托洛茨基主義”的錯誤，說“托洛茨基主義”是一個“小資產階級半孟什維克”的偏差。^{<5>}這個運動在思想、政治平面上的主要慫恿者之一是季諾維也

夫。他的動機似乎是想成為黨的領導，成為列寧的後繼人，因此，想要把托洛茨基這個大眾的選擇、列寧本人的選擇排除出政治局。但是，在背地裡，早已操縱了整個局勢的是斯大林，要打敗反對派的也是他。<6>他所使用的方法不但是行政的——壓制性的，而且是犯法的。<7>

在1923年初的第十二次黨大會之後，黨領導層內部的情勢已變得尖銳了，在那個時候，大家都知道列寧有個《遺囑》，而這個遺囑尖銳地攻擊斯大林，並且建議將其黨總書記的職位撤換。列寧與斯大林的決裂並不是基於個人考慮（例如斯大林對列寧的伴侶克魯普斯卡婭的粗魯態度）。它是從深切地關切黨和國家的官僚化過程、一個困擾著列寧生命的最後一年的擔憂而來的。<8>斯大林使用了他所能使用的每一個方法和花招來阻止黨大會實行列寧的忠告。他甚至毫不猶豫地對列寧作出人身攻擊。（斯大林在許多次演說中把列寧致第十二次大會的信描述為“一個病人的產物”，不代表“真正的列寧”。）

列寧為第十二次黨大會所準備的反攻是基於與托洛茨基的聯盟。他要求托洛茨基在大會上提出格魯吉亞的問題。托洛茨基雖然與格魯吉亞的反對派有很好的友誼，但他沒有依從列寧的話，<9>為民族共和國的平等的原則而辯護的工作留給賴可夫斯基去做。<10>托洛茨基在第十二次大會上保持靜默的態度，一直是他的政治生活的最大神秘之一。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的三頭執政被列寧的信深刻地震動，企圖與托洛茨基作出某種了解。托洛茨基同意了。為什麼？這是他一生中“所失去的”最大的“機會”嗎？

他的最重要的傳記作者們——Isaac Deutscher〔中譯名為伊薩克·多依徹〕、Pierre Brou'e、Ronald Segal、Knai-Paz、Viktor Serge、Tony Cliff、Volko gonov——作出各種的解釋：他不要在列寧還活時給人看起來好像他在爭做列寧的繼承人。他以為他已經是勝利者，所以他要在勝利中顯得非常大方。他低估了斯大林，這種低估源自他自己的優越感。他寧願集中精力來處理對他似乎是更重要的政經政策問題（NEP〔新經濟政策〕、市場和計劃之間的關係）。他不要威脅黨的團結，包括它的領導層的團結。他是太要調和了，從來不為他自己的正確觀點而堅苦地、不妥協地戰鬥，這是他的好友越飛在他出名的1927年遺信中所作的一個指

責。他怕這樣做像在證實“老布爾什維克”中間所存在強烈反對他的偏見。等等。

在這些相爭的解釋中，我們很難作出決定。說當時托洛茨基的動機是複雜、矛盾的，也許是有道理的。他從來沒有在他生命後期，對這個與加米涅夫、斯大林所作的“極差勁的妥協”提供一個解釋。我自己的意見是，它不是像他的傳記作者們所假定的那麼明確。我倒傾向於認為，托洛茨基在他的自傳<11>中所提供的“社會學/心理學的”分析大致上是正確的，雖然它並沒有解釋他為什麼採取被動態度：

我已經說過，列寧在臨死之前，準備對斯大林和他的盟友捷爾任斯基和奧爾忠尼啓發動攻擊。列寧本來對捷爾任斯基的評價甚高。兩人之間的疏遠，開始於捷爾任斯基意識到列寧不認為他有能力管理經濟工作的時候。這件事把捷爾任斯基推向斯大林的懷抱，在此以後，列寧決定把他當作斯大林的支持者之一而加以攻擊。至於奧爾忠尼啓，列寧本來因為他的作風像個〔殖民地的〕總督而想要將他開除出黨。列寧答應全力支持格魯吉亞布爾什維克反對斯大林、捷爾任斯基和奧爾忠尼啓的短信是寫給穆迪瓦尼的。這四個人的命運最生動地顯露了斯大林派在黨內所策劃的具有決定性的變化。列寧死後，捷爾任斯基被放在最高經濟會議的主腦的位置上，那就是，負責所有的國家工業。奧爾忠尼啓本來是要被開除的，現在卻被任命為中央管制委員會的主腦。斯大林不但仍然擔任總書記，與列寧的意願相反，而且被組織給以前所未聞的權力。最後一個人，列寧所支持的反對斯大林的布杜·穆迪瓦尼現在卻被關在托鮑爾斯克監獄裡。在黨以及〔共產〕國際的各黨中的整個人事管理系統都發生了同樣的“改組”。不肖門徒的時代與列寧時代不但相隔著觀念上的鴻溝，而且在黨的組織上也有全盤的翻轉。

斯大林在實行這個翻轉的過程中一直是主要工具。他有天生的處理實際事務的能力、堅強的意志和堅持實行他的目的的決心。……他的想法完全是經驗主義的，一點都沒有創造的想像力。對黨的領導集團而言（他在較大的圈子中根本不出名），他總是個似乎是一位命中註定拉第二、第三把小提琴的人。今天他在拉第一把小提琴的這個事實，並不表示他的人品使他有這個資格，

而是因為這個國家正處在政治後退的過渡時期。……斯大林主義比所有其他更是不受個人偏好影響的組織在革命衰退中自動產生的東西。

（《My Life》〔《我的生平》〕第506頁）

……我對自己說，我們正在渡過一個反動時期。階級之間正發生著政治的移動，階級自覺也正在變化。經過了偉大努力之後，就有了反衝。……反動的深刻的分子過程正在表面化。他們的目標是根除、或者至少減弱人民大眾在意識上對十月革命的觀念、口號和活生生的人物的信任。（同上書第517頁）

換句話說，不管列寧的權威有多大，在當時的社會力量關係之下，列寧向第十二次大會投擲的“炸彈”，即使得到托洛茨基的勇敢的支持，也不會決定性地減弱斯大林和“秘密”政治局所領導的官僚的黨結構。列寧的遺孀在1926年以以下的话十分恰當地總結了當時的情勢：“如果列寧在今天還活的話，他也会被關在監獄裡。”我們不應該對這個說法作出太宿命論的解釋。不過，托洛茨基若在第12次大會上進行更勇敢的干涉是否對局勢的發展會有影響，仍然是一個尚未解決的問題。

列寧的逝世及它的立即的後果，增加了黨領導層內的緊張狀態。斯大林做了一件使人完全料想不到的事實：他在列寧墓前發表演說，首次在大眾的眼中以列寧的一位繼承人的姿態出現。（托洛茨基當時因病不在莫斯科。葬禮的日期故意不告訴他，所以他不能夠參加。）但是，使黨的官僚層有可能禁止任何嚴肅的討論，主要還是允許大量沒受過政治教育、沒有經驗的工人們介入黨的決定（所謂“列寧的動員”），因為官僚層可以操縱這些大部份是被動的黨員。在這同時，反對反對派的運動密鑼緊鼓地進行；反對派被正式地譴責、被正式地禁止發表意見。在第13次黨大會、第五次共產國際會議上，反對派被譴責為一個“右翼小資產階級偏向”。

二

統治集團與左派反對派之間的初次戰鬥並不是突然而來的。在中層幹部和工人布爾什維克的眼中，這是一個在黨內、在社會上存在了好幾年的衝突的繼續。他們把這個衝突看成為蘇聯共產黨人、俄國更廣大的工人階級和勞工運動所面對的緊迫問題的表現。但是這種繼續，卻在黨內，引起人們對左派反對派

做法，有著非常矛盾的反應。

左派反對派的鬥爭似乎是早幾年的類似的反對派團體的鬥爭的繼續，特別是以斯米爾諾夫為中心的民主集中派<12>、以希亞普尼科夫、柯隆泰為中心的工人反對派<13>的鬥爭。這些小派別也反對黨機關的越來越大的權力、與布爾什維克的黨內民主和組織傾向的自由傳統的決裂、日漸增大的壓制傾向、民主集中制向官僚集中制的轉變和尤其是黨與工人階級的眼前及長遠利益的越來越大的衝突。

可是，在先前這兩場鬥爭中，左派反對派的主要領導人們，特別是托洛茨基和普列奧勃拉仁斯基，卻反對這些反對力量。他們完全支持以列寧為首的黨領導層對這些派別的譴責，而且，在許多方面，甚至對如何進行譴責也起了帶頭作用。因此，就使斯大林非常容易地利用他們自己先前所指責的“宗派活動”、“工團主義偏向”來反對左派反對派。那就是斯大林所重複使用的花招，當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以及以後的布哈林、湯姆斯基和賴可夫採取反對立場的時候。

在黨員中間，也有一些人懷疑左派反對派的民主——無產階級的方針的意義，如果不懷疑他們的忠誠的話。為什麼他們到現在才提出他們的抗議和建議？為什麼他們先前不支持工人反對派？這真的是為原則而鬥，而不是如惡毒的謠言所傳的，只為權力而鬥嗎？從左派反對派的觀點看來，更消極的是，在反工人反對派的鬥爭與1923年的交鋒之間，還有另外一個鬥爭這個事實——在第十一次黨大會上達到高峰的、關於工會問題的爭論。這個關於工會的鬥爭，是列寧建議與托洛茨基結盟反對斯大林之前，與托洛茨基的最後一次尖銳衝突。在這個鬥爭中，托洛茨基似乎在為“指令——行政管理”的立場辯護，而斯大林在表面上似乎支持列寧的對工人較為友善的概念。

甚至在今天，這個爭論的許多方面還是不太清楚。<14>歷史學家們曾把托洛茨基對工會的態度是他要“勞動軍事化”，這對他是相當不公平的。我們發現，持有這個觀點的歷史學家，不但是接受斯大林的偽造的人們，而且有站在資產階級、社會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立場批評托洛茨基的人們。大多數的這些批評家，忽視這個事實。那就是：第九次黨大會所通過的有關於“勞動軍事化”的決定，是整個黨所贊同的，包括工人反對派的領導人們。他們也忽視了托洛茨基的論點明顯地著重“勞動的軍事化”只有在大

多數工人自願的支持下才可能行得通的這個事實。

仍然是一個事實的是，托洛茨基在這個問題上是錯了，而這個也是普列勃拉仁斯基和布哈林所共有的錯誤，使黨內的人們對於左派反對派領導人們之作爲工人利益保衛者的可信性，打了一個問號。隨著時光的流逝，在黨內矛盾中的這些連續性和非連續性，日益增加地與俄國革命命運的問題連在一起：如果革命不向中、西歐擴散，俄國工人們能夠保持權力嗎？提出這個問題的人不止是孟什維克和西方社會民主黨人；它也是俄國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布爾什維克、列寧和托洛茨基從不迴避的問題。他們的回答通常是：不能。對布爾什維克及對托洛茨基而言，這個回答不是指在短期之內，而是指在一個較廣闊的歷史意義上。這一點就是布爾什維克在1917年之後與孟什維克、“極左派”之間的決定性的分歧。

爲了爭取時間，保持、保全國家政權直至他們由國際革命的下次上漲所挽救，暫時的後退、挫折和妥協是被看成爲可能的事。列寧把新經濟政策看成爲無可避免的、但是有限的後退，就是在這個意義上看的。但是在這同時，以下的問題也被提出來：在這樣的後退中，對蘇聯的工人階級和政權會怎麼樣？在一個經濟、文化落後、受到敵對的資本主義環境所孤立、包圍的國家中，工人們真的可以行使權力嗎？正像法國革命一樣，俄國的熱月反動有可能發生嗎？這樣一個熱月反動會走向拿破崙式的獨裁政體嗎？誰可能會扮演蘇維埃拿破崙的角色？可能會是得人望的紅軍領袖托洛茨基嗎？這些都是黨領導圈子在私底下所主動討論的問題。在回答這些問題時，黨的大多數領導人們和中級幹部他們自己，卻變成了他們的錯誤判斷的受害人。由於托洛茨基的政治立場和理論修養，他絕對沒有準備在1920年代的蘇聯擔當俄國拿破崙的角色。黨的大多數領導人們完全看不到，斯大林在創造能使他擔當這個角色的一切實際的先決條件上，真正所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斯大林真正所做的事情，是憑藉他們的積極合作的。這個黨的悲劇就是，幾乎所有它的領導人們，甚至那些在斯大林派系內的人，到最後才認識到這一點，但是，既不是大家一起認識到的，也不是早到足以阻止他的時候。他們都爲這個錯誤付出了他們的生命。

三

蘇維埃熱月反動的問題有許多維度：政治的、經

濟的、社會的和意識形態的。能夠把所有這些維度綜合在一起、成爲一個內容協調、可解釋的理論，是托洛茨基的一個偉大歷史成就。隨著他的不斷革命論，這是他對馬克思主義第二個大貢獻。

俄國革命的退潮，是與俄國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的退潮有直接關係的。後者則與以下幾個因素有直接關係：工人階級的經濟苦難和在數量上、社會重量上的微弱，國際革命的失敗，以及，隨著時光的流逝，戰鬥精神的逐漸耗盡和一當物質條件許可時要過安定生活的欲望（感謝新經濟政策）。但是，這不是直線的發展、註定要導向斯大林主義獨裁。我們必須認知在這條道路上的幾個決定性階段，而且，爲了政治的行動和理論清晰，從此得出正確的結論。

從歷史上看來，國際革命的長期後退、俄國工人及其先鋒隊對革命擴張機會的懷疑，都不是必然的。據托洛茨基看來，新的革命勝利的機會會在東、西兩方出現。這會引起工人們的政治注意力，甚至可能會在蘇聯的先鋒隊中間產生新一層的承諾和革命熱忱。俄國革命後的二、三十年中的事件證明托洛茨基是對的：德國1923年，中國1925-27年，西班牙1936年。^{<15>}因此，替俄國以外的各國共產黨爭取正確的戰略、策略的鬥爭，以及在共產國際中進行那種會促進國際革命而不是阻止它的俄國干涉，也在反蘇維埃熱月反動的戰鬥中，扮演了緊要的角色。^{<16>}共產國際的、至少局部被蘇維埃官僚層的特殊社會利益所決定的錯誤政策，幫忙把這些革命前夕、革命中的群眾鬥爭轉變爲一連串的失敗。只是到了這個過程的末尾，不是它的開頭，蘇維埃熱月反動的鞏固才變得無可避免。

對國際革命擴張的懷疑、回到安定生活的欲望，在（1923年以後）幹部中間比在普通工人中間熱烈得多。對於幹部而言，這有一個堅實的物質基礎，因爲有日益增多的非常實在的物質特權歸他們處理，這是普通工人所沒有的。對工人而言，回到私人生活即意味回到匱乏。對幹部而言，那是一種撤退到“快樂”。斯大林之突然宣佈“一國社會主義”論，意味著與馬克思主義傳統、列寧遺志的完全決裂。這個理論幾乎十足地表達官僚機構的心理——意識形態的需要。（我說“突然”是因爲，我們可以很容易地從文件上看到，黨的官方路線一直到1924年還是說完全相反的話。）

但是即使在這裡，我們也不能對官方政策上的這

種突然轉變的矛盾性質，閉目不視。斯大林、布哈林的“一國社會主義”論，不只是相應於蘇維埃官僚層的保守傾向。對於千千萬萬的蘇聯共產黨員而言，它似乎給“現在應該做什麼？”這個問題一個可接受、可信任的回答。與其等待越來越不可能成功的國際革命，我們為什麼不集中力量來建設我們自己的社會呢？這就是斯大林的提議，對大多數人而言，它似乎是一條現實的、可以選擇的道路。

可是，左派反對派並沒有簡簡單單地建議“等待國際革命”。它更沒有把他們自己看成為像喬治·路卡克斯直至1960年代底還在譴責托洛茨基的面對著“不是資本主義復辟就是革命戰爭”這個進退兩難的窘境。剛好相反：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極力主張同時推行一條正確的、會好好地利用非常真實的國際革命可能性的共產國際政策和在俄國加速工業化、現代化。斯大林——布哈林集團完全反對托洛茨基、左派反對派的這兩個相互有關的建議。他們的反對表達了“一國社會主義”論的保守性質。

我們在這裡所討論的，不只是選擇一條合理的政治道路的問題，還有社會的、社會——心理的過程。因為在歷史上，某些社會集團怎樣解釋計劃、建議或政綱，也起著不是無足輕重的作用，相當獨立於這種政綱的客觀內容。〈17〉

從社會——政治方面說來，托洛茨基和左派反對派的民主、經濟的建議（將在第四章中討論），以及稍後的聯合反對派的建議，都代表了一個創造更有利的物質、國際條件的企圖，使蘇聯工人階級能夠再度以主動、獨立的精神干預事態的發展。這是反對蘇維埃熱月反動的鬥爭的第二個決定性因素。這裡又需要著重地指出：這個鬥爭的結果事先也是無法決定的。對工人們的權力和權利的攻擊，雖然日益增加，但也遇到工人們的抵抗。〈18〉共產黨本來可以支持這種抵抗，但是選擇了試圖制止、阻止它，最後竟用恐怖手段將它淹沒在血泊中。只是在這一連串事件的末尾，反革命的勝利才是必然的。在它的開頭，還有可能將它減慢，如果不能完全阻止它的話。

歷史的事實顯示，這個“可能”並沒有發生。它的原因，首先是黨領導層中絕大多數人不了解這個問題的社會特性。他們只把它看成為一個純粹的權力——政治的、機構的問題，換句話說，一個官僚——行政的問題。這個觀點是生根在黨與工人的關係的一個代替主義的觀念中：無產階級專政是由黨在

列寧主義中央委員會的領導下所實施的。懷疑這個黨領導層，就是懷疑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人決定一切事情”。起決定作用的，並不是黨與工人階級之間的相互作用，更不是工人們的自我活動；起決定作用的，只有無所不知的黨領導層（到後來，無所不知的總書記）。

托洛茨基的偉大的理論成就是，他幾乎從開始，即是從1923年，就解開了這個（希臘神話中弗利基亞國王）戈爾迪打的難解的結，因為他認識到蘇維埃官僚層的社會墮落，換言之，這個官僚層向一個特定的、有它自己特別物質利益的社會階層的轉變。黨機構之保衛對政治權力的獨霸，是以它為保衛、擴大它自己的物質利益的一個方法。這件事情，在蘇聯共產黨領導層內，除了托洛茨基之外，連最有本事的馬克思主義者，要麼認識不出來，要麼認識得不夠。

為了向這個蘇維埃官僚層發動一個堅持不懈的鬥爭，正確地了解這個社會轉變是非常必要的。可是，他們一直到末尾，都沒有理解在他們自己黨內的這個社會轉變的程度。〈19〉他們一直在幻想，黨領導層或者斯大林本人會回到正確政策上去。當他們被拉進這個集體整肅的漩渦中時，他們在心理上、政治上都找不到支撐的力量，因為他們不了解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20〉

對黨的墮落過程這種悲劇性的缺乏了解，是蘇維埃熱月反動的基本特徵之一，可以與法國熱月反動相比擬。熱月反動不簡單地是反革命。它是在一個強有力、被數以百萬計的人民的熱情所推動的革命之後的一個政治反革命。革命活在許多這些人民的腦海中。他們認同它的成就、它的精神和它的新價值。政治上的反動不能夠取勝，或者它的勝利會極其困難，如果它公開、完全與革命傳統決裂。

因此，熱月反動在起初以革命的繼承人出現，不是以它的掘墓人出現。所以，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這種特定的結合，甚至使劇中人物中的最聰明的人也很難以清楚地認識到發生中的事情。只有慢慢地，反革命的非連續性因素與革命傳統相決裂，才開始佔主導地位，取代了革命連續性的位置。托洛茨基的歷史成就是，他比絕大多數的共產黨員更早認識到這點，而且對它提供了一個理論解釋。

（未完待續）

註釋：

- <1> 《四十六人的政綱》，收集在托洛茨基的《左派反對派的挑戰（1923-25）》中，紐約1975年第397-403頁。
- <2> 同上書，從第64頁開始。
- <3> “新路線決議案”，見同上書第404-413頁。
- <4> 三頭執政團知道得非常清楚，黨內許多人，尤其是基層黨員，非常反對幹部機制。所以他們極為小心。季諾維也夫在革命六週年紀念日承諾要恢復（！）黨內民主（《真理報》，1923年11月2日）。
- <5> “全蘇聯黨會議得出結論說，就目前的反對派的身份而言，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看見修改布爾什維主義的企圖，不但看見直接背離列寧主義，而且看見清楚表達出來的小資產階級偏向”（1924年1月舉行的第十三次黨會議的決議案，收集在Robert V. Daniels的《由文件組成的共產主義史》，第一卷，倫敦1987年，第165頁）。
- <6> 1990年3月在德國伍珀塔爾城舉行的托洛茨基論壇會上，南斯拉夫歷史學家Marjan Britovsek，對三頭執政團在托洛茨基的新路線的問題上所施行的花招，提出了一個詳細的分析。見Marjan Britovsek的《Das Dilemmata des "Neuen Kurses"》〔《“新路線”問題上的進退兩難》〕，收集在Theodor Bergmann和Gert Schäfer合編的《Leo Trotsky-Kritiker und Verteidiger der Sowjetgesellschaft》〔《托洛茨基——蘇維埃社會的批評者與保衛者》〕Mainz 1993年。
- <7> 斯大林篡改了莫斯科黨組織的選舉結果，在這次選舉中，事實上反對派獲得了多數。
- <8> 在列寧的《遺囑》中，他指出斯大林與托洛茨基之間的衝突對黨的危害。他建議應該撤換斯大林的總書記職位。他也堅持主張數百位工人和農民應該進入中央委員會，但是只限於那些仍然在生產崗位上的，不要那些已經是官僚化的蘇維埃機構的一部份。在這同時，他要求托洛茨基與他結成同盟，反對斯大林。見他致托洛茨基的信，收集在托洛茨基著的《我的生平》，紐約1960年，第38-40章。Moshe Lewin的《列寧的最後一次鬥爭》（倫敦1975年）也談到這份遺囑及列寧與托洛茨基之間的關係。
- <9> 然而，在黨領導層之內，托洛茨基在“格魯吉亞的問題”上，是捍衛他和列寧的立場的，他又是唯一主張公佈列寧遺囑的人。
- <10> 賴可夫斯基的“對第十二次黨大會的演講”是收集在Gas Fagan所編的《蘇聯1923-1930年之間的反對派選集》，倫敦1980年。
- <11> 《我的生平》，紐約1970年。
- <12> 關於民主集中派，見Robert Daniels的《革命的良知》，Harcord 1960年。
- <13> 工人反對派和民主集中派的文件的片段，收集在Daniels的《由文件組成的共產主義史》。
- <14> 在這段時期的歷史記載中，常常被人忽略的是托洛茨基的建議：工會應該訓練工人替代工廠廠長來管理大企業，因為這個做法明顯地是走向工人自我管理的一個步驟。這個建議得到布哈林的熱烈支持。
- <15> 蘇聯工人對1923年德國革命的漲潮非常感興趣，而且加以熱烈的支持。他們對於西班牙人民的奮起抵抗法西斯政變也抱著同樣的態度。Pierre Broue在他的出色的書（《Staline et la revolution - le cas espagnol》〔《斯大林與革命——西班牙事件》〕）中，對斯大林和他的幫兇們扼殺西班牙革命所用的機制，提供新的證據。
- <16> 許多歷史學家堅持地認為，列寧本人曾使國際革命的利益臣屬於俄國國家的利益，但是這種斷言在實際經驗中是沒有根據的。這種事實真正開始發生是在1930年代，雖然它早已包含在“一國社會主義”的理論之中。
- <17> 托洛茨基指出，在斯大林主義、法西斯主義這兩種事例中，完全荒謬、非理性的神話能夠在歷史中真正起作用。
- <18> 見Charles Bettelheim的《Luttes de classe en URSS》〔《蘇聯的階級鬥爭》〕，上下兩卷，巴黎1972-1974。
- <19> 紅色管弦樂團團長Leopold Trepper贊托洛茨基主義者們為唯一至死不向斯大林投降、至死不被壓服的共產黨員。Trepper用以下事實解釋這點：他們是唯一清楚了解斯大林主義本質的人們，而斯大林的其他共產黨員受害者卻完全失去了士氣，因為他們從來沒有了解降臨在他們頭上的命運。可是圖哈卻夫斯基是例外。見Leopold Trepper的《大遊戲》，倫敦1977年。
- <20> 布哈林一直到死還持有“斯大林同志”會救他的幻想。若要知道最近在蘇聯檔案中發現的布哈林致斯大林的信函的詳細記述，見Alec Nove在1994年1月21日的《New Statesman》〔《新政治家》〕上所寫的文章《抱怨到最後》。

Problems and Difficulties of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Zone in China

Zhang Kai

Half a century afte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as set up, the CPC announced its attempt to develop the Western zone. This includes 11 provinces and the Chongqing Municipality. Most of the remote areas are inhabited by national minorities. The zone is characterized by underdeveloped infrastructure, inconvenience of transport, and slow economic development. Its weight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was only 14.5% in 1995, yet its population was around 360 million, amounting to about 30%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of the country; its land area was almost 60% of the country's area.

The increase in income was very slow for the rural population,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mountain areas. The official statistics have it that in the last two years, there has been some improvement, and the average per capita annual real income of the urban population in some provinces in the West amounted to RMB 4,500 yuan and even 6,000 yuan. How inflated the figures are, one cannot know. The rural situation is certainly worse. According to a report by a journalist of the Hong Kong TVB, which was broadcast on June 11, the interviewee, Jiang Jian, a volunteer to Yunnan from Shanghai, said that the monthly income of the mountain population in Mojian County, Yunnan, was one or two hundred yuan. *Apple Daily* reported on June 29 that the per capita annual income of peasants in Guizhou Province was a mere 1,400 yuan.

Premier Zhu Rongji's explanation to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March 2000 about the move to develop the West was: "This is significant for the expansion of the domestic market, sustained grow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regional economies, for the ultimate realization of common wealth, unity of the nationalities, maintenance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consolidation of the defense of the border areas."

The picture that was drawn was grand, but the context in which the project was conceived and the difficulties underlying the project were complicated. Economically, with the impact of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on China, and in addition, the anarchy of the market economy, there are huge stocks of unsold goods. One solution is to look for domestic markets. However, the general poverty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West does not actually provide the market for these goods. It would require a lot of investments by the state on infrastructure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before the West can be a significant market for domestic goods.

Politically, the tensions and conflicts between the Han and the national minorities is one key issue in the question of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When a Hong Kong delegation of businessmen was to visit the West to probe investment possibilities, a statement of serious warning was issued by the East Turkistan Information Centre which is an organization fighting for Xinjiang independence. There was also a serious confrontation between Han and Uyghur students of the Chang-an University in Xian. Foreign investments into Xinjiang were seen by the East Turkistan Information Centre as incurring massive influx of Han people into Xinjiang as against the minorities there.

Socially speaking, the instabilities of Chinese society are aggravating. Zeng Qinghong, Director of the CPC Organizational Department, wrote a report entitled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China 2000-2001: Study of the people's internal contradictions under a new situation". It pointed out that the indignation of the general populace about social and economic inequalities, corruption of officials and indifference of cadres has seriously aggravated. There is an increase in economic, ethnic and religious confrontations. Massive protests are spreading everywhere, and participants sometimes numbered over 10,000. The rural-urban, East-West and rich-poor gaps have widened to a point of warning. "Our accession to the WTO may bring more risks and pressures, and it is expected that more mass actions may erupt and seriously affect social stability, or even affect the peaceful implementation of Reform and Open Door policy."¹

What people are most discontent with,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report on the mentality of Chinese urban population"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are, by order of priority, employment, corruption, divide between rich and poor, and deterioration of social morality. 88.9% of the interviewees were most discontent with the question of urban employment.²

As for government investments in the West, despite the rhetoric about increasing investments, the weight of investment betwee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zones has been unfavourable to the West. The Eastern zone constitutes 10% of the country's area, but received, in 1999, fixed assets investments of 1,294 billion yuan as compared to 477.3 billion yuan and 344.6 billion yuan for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zones respectively. In 2000, the figures were, respectively, 1401.5 bn, 543.2 bn, and 394.3 bn.³ In 2001, th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investment into the Western zone will be around 300 bn yuan.⁴

Without a radical increase in government investment, the hope of investments for developing the West goes to private foreign investments. Favourable conditions have been offered. The state has announced three tariff concessions for investments going to the Western zone. Various provinces make their own concessionary offers. Shaanxi Province promised that when outsiders buy up state-owned enterprises, they need not commit to the old debts; procedures will be simplified to facilitate investments; the government will take care of the relocation of surplus labourers. A Hong Kong businessman, coming back from the visit, commented that the promises made by the government "were too good to be credible."

Xinjiang also offered concessionary measures, including allowing foreign investments to have resource-exploiting rights and market sharing rights. As for land use rights, there were concessions on rent or sale price.⁵ Four days after report of the above was published, Wen Hui Bao published a statement by Hu Zhizhi, Director of the Land Use Bureau under the China National Land Resources Department, which reiterated that land is state owned property, land transactions at prices lower than those stipulated in state regulations are not allowed, and such acts may be regarded as criminal acts.⁶

China has an annual foreign capital inflow at USD 42.7 billion. Up to the end of April this year, 371,000 foreign enterprises have been allowed to operate in China. The total investment fund of contracts signed with foreign investors amounted to USD 696.9 billion, and the actual amount in usage was USD 359.5 billion. It is expected that after China's accession to WTO, annual inflow of foreign funds will exceed USD 50 billion. As for Hong Kong's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up to end of April this year, it was USD 174.2 billion, which was 48% of China's total foreign investment. After the announcement of China's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zone, some Hong Kong newspapers and businessmen have been using the term "conquest of the West". This indicates the mentality of capitalist conquest. One serious concern that has been expressed is the ruthless exploit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dire consequences for the environment. One example is that the Xinjiang Construction Corps has stated its decision to develop the dyeing industry,⁷ and in Xinjiang where water resources are very much in shortage and much reliance is on underground water,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environment is unimaginable.

Scramble for profits and exploitation of the natural resources are some of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 28 June 2001

2 Quoted from *Ming Pao*, May 3, 2001, on 2001 Social Blue Paper published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3 The 2000 figures were from the 2000 bulletin of the State Statistics Bureau; the 1999 figures were calculated from the increase percentages indicated in the above bulletin.

4 The figures were revealed by Li Zibi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State Council Western Zone Development Bureau, and reported by *Wen Hui Bao*, May 12.

5 *Wen Hui Bao* May 29.

6 *Wen Hui Bao* June 2.

7 *Ming Pao*, May 30.

1 Quoted from *Apple Daily* June 6, 2001, and *Oriental Daily* June 4, 2001.

目錄

香港

- 2 人權公約在香港特區..... 振言
4 警權膨脹 港府色厲內荏..... 微波

中國

- 5 評江澤民的建黨80週年講話..... 張開
8 西部大開發的意圖和難題..... 張開

國際

- 11 小泉參拜靖國神社為軍國主義鋪路..... 高島義一
12 日本新歷史教科書的胡說..... 韓勝東
15 美軍立即停止挑釁性偵察活動。(日本)沖繩反基地鬥爭組織委員會
16 從天安門到熱諾亞..... 趙京
17 以巴衝突——阿拉伯人為自決權而戰鬥..... 巴勒特
20 沙龍——以色列精神文明的真面目..... 蔚然摘譯
21 世界社會論壇在巴西阿雷格里港召開..... 圖森特
23 遠左派在英國大選冒升..... 索內特
24 資本主義的瘋狂帶來瘋牛症..... 加里
26 英國處理口蹄症的背後..... 斯康撒古馬爾

特譯

- 29 21世紀宣言——150年後的《共產黨宣言》..... 伍德茲
37 以托洛茨基作為可供選擇的道路(三)..... 曼德爾

英譯

- 43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Zone in China Zhang Kai

OCTOBER REVIEW VOL.28 ISSUE 3 2001.9.15

HONG KONG

- 2 Human Rights Convention in HKSAR..... Zhen Yan
4 Behind the extensive police power..... Wei Bo

CHINA

- 5 On Ziang's talk on CCP 80th Anniversary..... Zhang Kai
8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Zone in China..... Zhang Kai

INTERNATIONAL

- 11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prepares for Militarism..... Takashima
12 The new Japanese history textbook..... (tr)Feng Kerui
15 US Army stop provocative spying..... Committee Against US Bases

- 16 From Tiananmen to Genoa..... Zhao Jing
17 Arabs fight for self-determination..... T.Barret
20 Sharon - the true face of Israeli civilization..... (tr)Wei Ran
21 World Social Forum in Porto Alegre..... E.Toussaint
23 Far left gains in UK election..... A.Thornett
24 Mad cow, mad system..... M.Gari
26 Burying British farming..... B.Skanthakumar
29 21st Century Manifesto..... A.Woods
37 Trotsky as alternative (3)..... E.Mandel

ARTICLE IN ENGLISH

- 43 Problems of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Zone in China..... Zhang Kai